

1571.25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文史参考资料汇编

· 第6辑 ·

民盟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小组编

我的自传 张国藩 (1)

李叔同年谱 (征求意见稿) 朱经畲 (11)

追忆先父李叔同事迹片断 李 端 (22)

袁世凯与北洋军阀集团 徐景星 (30)

《北洋军阀史稿》讨论会纪要 (53)

附：《北洋军阀史略》日译本绪言（摘要）

250.6
3
:6

一九八三年五月



B

087037

我的自传

张国藩

一、简史

我的曾祖父是一个贫农的儿子，原住湖北安陆县北乡大花店张家湾，因生活困难，过继到附近的另一姓张的人家（与曾祖父本不同宗）为嗣子。过了一些年头，待祖父过世时，原继承的十多亩土地又卖完了。祖父^①长大了，就又携带着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搬到榔林岗张家湾（此张姓与曾祖父的继父为同宗），佃种大地主（拥田一千五百多亩）张寿峰之田，藉以谋生。我的父亲就是我祖父最小的儿子。

初搬到这里，祖父因为孩子又多又小，每年打一点粮食，除了交地租以外，所剩无几，全家生活非常困苦。我小的时候，常听到伯父、父亲、姑母等谈他们小时候与生活作斗争的故事。姑母说她六岁就学纺线，每天能纺四两；伯父说他们如何领着我的父亲到地主门口讨饭，看见地主的狗钵里的饭又白又热，就乘人不見的时候，把狗打跑，把狗钵里的饭倒在自己的釜内。这些故事，到现在还很深刻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待伯父^②和父亲长大，生活就好一些了。二伯父（大伯父早死）和四伯父学木匠，三伯父到城里知县衙门当学徒，父亲在农闲的时候念书，农忙的时候就在家帮忙。这样，每年不但够吃够用，还有一点富余。父亲也要娶媳妇了。

但是这种情况就为万恶的地主所不容。张寿峰看见他的佃户搞得比好过一些了，就说这是由于他的田好，能多出粮食，硬要加租。加了一次不算，还要加第二次。伯父和父亲拒绝了。地主说祖父是葬在他的山上，硬要伯父迁坟。伯父等认为坟址是曾出了三石谷的代价买的，又拒绝搬迁。地主认为这样的佃户太可恶，就在县里控告伯父“霸占坟山，拒不交租”。幸有三伯父在县衙门当学徒，托人说了个情，给了地主几石谷子，退佃搬家了事，伯父等才未被关在监牢里，逃脱了地主的网罗。

退了张寿峰的田，父亲和伯父就又搬回老家——大花店张家湾来了。先是借了人家的几间茅棚居住，随后就卖了几亩田和一块山，在山边盖了几间房子，二伯父、四伯父和父亲的全家就都住到这几间他们亲手所盖的房子里。

在这儿，二伯父和四伯父继续作木匠，父亲在农闲的时候来往湖北、河南的边境，贩卖牲畜赚几个钱。这样家里的生活逐渐又好转，到我出世的时候（1905年），家里将近有四石田（约合二十亩），是一个中农的家庭。

这种情形又为同族的地主所嫉。有一块山地原系我们的祖业，曾祖父离开的时候就

^①祖父名张益。

^②二伯父名新发，三伯父廷洪，四伯父廷秀，父名廷祥，别号稻丰。

K=250.6
88
2:6

BR 1126

把这块山地交给同族的人代管。伯父和父亲现在回到老家就要把这块山地收回，族人不肯，并唆使二流子张省与我家取闹，把父亲从河南带回的桃苗一千多株（栽在山下，已要开花结果的时候），悉数砍掉，因此父亲与张省又在县里打官司。虽然这块山判归我父亲所有，而家中却用了不少的钱，因此情况就不好了。

我父亲的孩子是比较多的，一共有六个儿子和五个女儿。这六个儿子当中，除大哥活到六十岁才去世外，二哥、三哥都是在二十岁左右去世的，另外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都是在十岁左右去世的。五个女儿当中有两个早夭，其他三个都出嫁了。这样一个孩子多，而又穷困的家庭，不但加重父母的负担，也使父母感到悲痛。母亲因为孩子多，操劳过度，在我不到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常常在外面不大管我，照顾我的生活就由年轻的哥嫂和姐姐负责，他们对孩子冷落的情况，是可想而知的。

我就是这样一个多苦多难的家庭生长起来的。我以后的思想和性情都与我家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从前面的叙述看，可见我伯父和父亲的性格是顽强的，敢与地主作斗争，敢与二流子作斗争。他们当然以此自豪，茶余饭后就常向孩子们吹嘘他们的本领。说他们如何不畏强权，如何能“白手起家”，盖房置地。他们经常教导我们孩子们说，一个人要在世界上生存，只有靠自己的本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其他的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爷有不如娘有，娘有不如自己有”等这一类的教导，就是我以后个人主义思想的基础。

父亲和伯父等认为他们有办法，能“从无到有”，混得不错，就自高自大起来，左右四邻，没有人是他们看得上眼的，因此就严重地脱离群众，前面所说的与族人张省的争吵也与父亲的自高自大是有直接关系的。父亲这样的作风，以及我小时候就丧母，失去家庭温暖，就成为我后来长期性情孤僻、不愿与群众来往的根源。

伯父和父亲所时刻不忘的，就是如何能拿地主张寿峰的后代出一口气，如何能拿二流子张省出一口气。但是他们无论怎样有本领，总不过还是个中农，年纪也越来越老，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了，就把这种愿望寄托在他们的后辈，特别是我身上。

我十岁入私塾读书，三年念完了《四书》《五经》之类的书，“初通文墨”，成绩很不错，二伯父就和父亲商量，把我送到城里进学堂。那时安陆县城里，有三所学堂：一所小学，一个初中是县立的，还有一所崇文小学是英国循道会办的。父亲打听的结果，认为前两所学堂学习秩序很坏，白花钱，毕业以后学生还是回家吃饭；崇文学校秩序好，毕业以后可升武昌博文学堂。博文学堂教的主要是英文算学，学了出来不是邮政局的局长，就是海关的监察长，每月薪水至少有六、七十块钱。这样父亲就送我进了这个崇文学堂，也就是我长期与教会学校接触的开始。

在崇文学堂，除遵照父亲的教导，起早睡晚，艰苦攻读外，没有什么多的事可记。只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父亲送我上学的目的和情况，可在此略为提及。第一，关于我的年龄问题。因为要想入博文，年龄不能超过十五岁，若是在崇文小学住三年，我的年龄就会超过了，父亲就把我的实际年龄改为虚龄（中国算法），少报了两岁。第二，就是我到十四岁的时候，父亲叫我加入基督教，以便作为将来我入博文中学的有利条件。虽

然我在后来曾否认过我是基督教徒，中学毕业以后在思想上不相信宗教，但在小的时候，是曾有这样一段经过的。

我在崇文小学毕业后，考了个最优秀，减费升入博文中学。这个学校也是英国循道教会办的，学费本来每年要一百二十块钱，我减费后每年只缴四十块钱。但就是每年四十块钱的支出，对父亲也是一个很重的负担，每年的学费常是东拼西凑，主要是靠舅父和两个姐夫家（他们是富农和小地主的成份）的帮助，所以我家里虽然不是地主，但我上学之成为可能，与地主的剥削是有关系的。

“博文”完全是英国买办式的学校，专注重英文算学，高年级的课本都是英文的。初中读一点中国史中国地理以后，到高中就学英国历史和英国地理，大半由英国人直接讲授。初到这个学校里，我当然是有什么就念什么，只求考试的分数好，不问内容如何。待进到高中的时候，我的思想就比较开展，除不放松课堂的功课外，还阅读了不少的杂书，如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其中尤其喜欢哲学，很欣赏丁文江与张君勱等关于“玄学论战”的文章。我对哲学的兴趣到中学毕业（1925年）的时候达到顶点，我那时立志要进大学专门学哲学去。这个幻想当然无法实现，因为我的命运是掌握在别人手里。

我毕业后，父亲希望我进海关，办学校人的意图也希望我走这条路（因为那时中国海关是由美国所控制的），但我考试结果，因为眼睛近视未被录取，使他们失望。学校的校长丁克生（英人）看我成绩不错，并且总是一味地念书，没有其他的想头，并且“还是一个基督教徒”，就决定要“帮助”我升大学，但是要签订合同，规定两个条件：一，到上海沪江大学学有关物理、数学、化学的课程，学完以后再回博文当教员。二，在大学所用之款，俟回来任教时分期扣还。这两个条件，我都欣然地接受了。但家庭因我上中学借贷很多，现在不能挣钱，又要升学，全家都反对。商议的结果，我缓一年升学，先在“母校”教一年书，把债务还清了再到大学去。

当我离开中学到大学的时候，满脑子是“崇英”的思想：英国制度好，英国民主，英国有不成文宪法，英国人有绅士气味，英国教会在中国办学校是做好事。我那时虽已不怎么信宗教，但对教会的存在却认为有一定的需要。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只有彻底的‘哲人’，才不需要宗教”。但世界上有多少“哲人”呢？我那时对帝国主义在中国传教的侵略意图，和它在中国所办的学校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干部学校”的本质，是全没想到的。

沪江大学是美帝国主义在上海办的一所高等学校。我初到这个学校时看见它房子不错，位临浦江边，风景又美，就觉得很为满意。每天课内课外，还是死啃书本，星期天也很少出校门。在第一年，我喜欢哲学的脾气还未改，虽然课内所学主要是物理、数学、化学之类，在课外还是看一些哲学之类的书籍。由胡适的《哲学史大纲》又引导着我看了一些考古的书籍，如《国故论衡》、《崔东壁遗书》等。这样混了一年到暑假，忽然觉得哲学一类的东西争来争去，无补实际，无益于国计民生（我那时就能够想到国计民生，可说是大革命对我的影响），就决然放弃看哲学和考古一类的书，认为中国是“以农立国”，就又打算学农。一面与博文的校长商议让我改行，一面就自己把图书馆

里关于农业的有数的几本书借来研究。我的请求当然不为我的“条约主”所接受，我只能垂头丧气地死心塌地念我的数学、物理。

我进大学的时候还是大革命开始的一年，但是我那时对革命完全没有认识。以为中国内战太多了，这又是一次内战。以后“宁汉分裂”，蒋介石在上海以及其他各处大肆屠杀青年，作威作福，我就很讨厌他（那时一般学生崇拜他的不少），认为他“不学无术、无端跋扈”，也是吴佩孚、张宗昌军阀之流。我也讨厌国民党员，他们在学校里不念书，终日无所事事，一点小事来了，就是开会发宣言，事情还是让别人作，我认为这是最坏的作风。对共产党则完全没有认识，也没有接触到一个共产党员，只听到他们在两湖发动反封建斗争的一些传闻。无论如何我只是埋头在书本里，“不问政治”，专心想做一一个学问家。并且认为政治是肮脏的，从此立志“不作官”。这个念头直到解放以后还曾坚持过。

总结在这所美帝国主义“高等学府”四年磨炼的结果，我在个人主义的道路上更向前迈进了一步，资产阶级的“单纯技术观点”、“单纯学术观点”，更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了。

一九三〇年大学毕业，按照契约回到“母校”博文任教。过了一年，“侥幸”考取湖北省官费留学美国，去学水利工程。

我去美国的这一年正是日寇侵占东北和湖北省遭大水灾的一年。当时情况下的离家去国，也难免有不少的感触。在上海上船的时候曾作了一首感慨诗，其中有“三城浸浩海，楼阁满虾鱼。东北进强虏，边疆无人戍。男儿欲何为，负籍学大禹”等句，以立志学大禹治水，来为自己在此时出国作解释。但后来证明，这个志愿是不够坚定的。在美国虽然学了水利工程，并取得了“博士”头衔，但在学的时候就很不老实。我一方面学水利，一方面又学物理，并且在水利方面，特别感兴趣的是它的理论部分——流体力学。由于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流体力学方面，就不得不学一些空气动力学与航空学。这就是我后来为什么能当十多年航空教授的缘故。这也表示在那时的反动政权下，办教育以至派遣留学生完全是装门面，是漫无计划的。学生到了外国，学习情况如何，生活情况如何，再也没有人过问了。“学成归国”之后，我照例到政府部门报到。那时湖北省政府主席是张群，我向他打了一个报告，要求分配工作，好久没有得到下文，我就决定去北洋工学院教书去了，此是后话。

在美国三年多的时间里，埋头学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所谓技术，结果是使我与祖国的实际脱离得更远。但有三次经历，我后来认为是美帝国主义给我的最大“教育”。它使我更清楚的认识到我是一个中国人，使我更痛恶当时反动的统治。（可惜我没有通过这些经历，更早地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本质。）

在美国一上岸就感到美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的歧视。上岸时海关检查，无论中国人所乘的是几等舱，一律排在最后，盘查中国人如同审问囚犯一样。这还不算，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和另一位中国同学（范治纶，在唐山铁道学院任教授）从西部乘火车抵美国中部——以匪徒最多出名的芝加哥城。到车站来接我们的有我大学的老师涂羽卿先生，他那时在芝加哥大学上学。我们一下车，就有三名便衣警察，不由分说地把

我们三人拥到一辆汽车里，直将我们送到一所警察局。在局里他们简单地问了几句，看了我的护照，就把我们关在一个监牢里。从上午九点一直到下午八点，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其中只教涂先生出去问了一次。等我们出来的时候才知道是抓错了人；据他们说，与我们同船来的有两个中国人没有护照，上岸了，他们认为老范和我就是那两个人。但是我们是持有护照的，护照上面有像片，这些事实，那因而且蠢的警察官是没有考虑或者故意不加考虑的。欺侮了几个中国人又算什么呢！

从监牢出来我们当然都非常愤慨，认为这不只是对我们的侮辱，而是对中国的侮辱，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就一直跑去找当时领事馆负责人，一位姓王的，他是王正廷的侄儿。我们把这段受辱的遭遇向他说了个遍，要他向芝加哥警察局提出抗议，要求道歉赔偿损失。他听了以后，不慌不忙地说：“便衣警察捉你们的时候，拿着牌子没有？”我们说没有看见什么牌子。他说：“若是没有牌子，你们可以用手枪打他们！”天哪！我们初到美国，哪知道牌子不牌子的规矩，就是知道，我们又从哪儿预备着手枪呢？！他这几句话问得我们啼笑皆非！我们所希望的抗议当然是过奢了！这是我一到美国所受的第一个有价值的“教育”。

中国人和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一向是受欺侮和被轻视的，特别是在“九·一八”后更厉害。有一次一位美国教授和我谈到中国的事情，他很严肃地问我，中国士兵会不会放枪。他说中国士兵若是会放枪，为什么在东北没有抵抗就让日寇占领了！他这样问得我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拱手送掉东北是蒋介石的主意，不是中国士兵的过错。但这些话，让这一位轻视中国人的教授听起来又有什么用呢？这是我在美国第二次受到最有价值的“教育”。可惜这位“幽默”的教授现在已不在人世了，不然，他的儿子或者是他朋友的儿子，将会告诉他中国人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会不会放枪。

我在美国得到第三次值得记忆的“教育”，是一位商人老太婆给我的。一九三三年夏，我们有四个人到美国西部去旅行，有两个中国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菲律宾人。我们到了加利福尼亚城，有一天在街上蹒跚的时候，看见一张鲜明的广告，上面写着“欢迎游客前往参观加城附近八大名胜，备有汽车和午餐，概不收费”。我们来的目的就是参观，有这样好的机会，当然不会放过。第二天一清早六点钟，我们就跑到招待站等着。七点来钟来了一位市俗气的老太婆，她看见我们黄皮色的三个人就问我们是哪一国的人，我们说两个中国人一个菲律宾人。她听后就不愉快地说：“对不起，中国人我们不想招待”。我们两个人听了就很愕然，我向她说广告上面说招待游客，没有说中国人不中国人啦？她说：“这是我们的规矩，没有办法”。我们感到争起来更惹得没趣，就回到旅馆，在归途中两人泪向心里流，感到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已落到如此地步，连菲律宾人也不如！我回到旅馆睡了一天，咬牙立志，回国后一定要好好地搞。待晚上那两位同伴回来了，问个究竟，才知道那个招待游览的勾当是美国一家地皮公司搞的，完全不是什么参观名胜，而是到郊外看地皮。因为按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中国人不许在那个州买地皮，那个老太婆看招待我们中国人无图利的希望，就不让我们参加。

在美国三年多的时间内，所受的欺侮和凌辱当然不只这三次，但是这三次是使我感痛最深的。我亲身尝到美帝国主义的警察、教授以至资本家的代理人老太婆都可以随便

欺侮中国人的味道。这就是我以后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腐化和无能，以及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中倡导拒绝所谓“美援”、“美国救济”的感性基础。

一九三五年回国后，一方面因为我所学的是比较理论的东西，一方面也因为湖北省政府不欢迎我到湖北水利部门工作，我就到北洋工学院教书。这种教书生活从北洋起，历经上海沪江大学、广州岭南大学、陕西西北工学院，胜利后回到北洋大学直到解放。

在这十四年的教书生活中，我曾经认为我是很努力地工作的。教书比较负责（当然也就比较认真地传播了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教书以外还作了研究工作，编写了三本书和完成了六、七篇论文。好多的教授教书以外就打麻将，我可不干这个，我读书，我作研究工作！我曾认为我是尽了我作教授的责任。我没有想到我是在认真传播资产阶级思想——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用一个所谓“学术”的墙把我与祖国广大劳动人民隔绝起来。

心里虽然恨蒋介石和他的反动统治，但是没有坚决地、彻底地投到革命阵营里来。自己虽作了一些反蒋的活动，例如在“一二·九”前后虽参加过“救国会”的活动；在陕南曾鼓励了一些进步教师和同学，并且曾设法使他们免于迫害（如孙家驹、殷开泰、程育等）；曾参加计划和发起“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进步组织；抵津后曾与地下工作人员（李峰等）联系，领导过北洋大学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美扶日”，“拒绝美援”，“反南迁”等斗争。但是这些活动都是业余式的。我的内心还是认为学术研究比政治活动更重要。我认为有的人可以专门去革命，有的人则应该专门研究学问。象我这样一个人应该发挥其特长，只有在不妨碍学问的研究时，来参加一点儿活动，骂骂蒋介石是可以的，若完全放弃学术工作来做打倒蒋介石的工作，未免牺牲太大。蒋介石打倒了，新的政权还是要有学问和懂科学技术的人呀，那时没有人搞学问了怎么办？这就是我那时把我的个人主义隐藏在研究学问的招牌下的糊涂思想。

在这十几年的教书生活中，因为我主要是在埋头教书和搞学问，社会的关系是比较简单的。在进步方面：除前面所谈李峰、孙家驹等人外，还有我的大、中学同学涂长望同志（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气象局局长），他是我最知己的朋友，我们的所有政治活动都是彼此知道的。在另一方面：有李书田^①和赖铤^②。与李书田仅是在西北工学院和北洋大学的同事关系，我们平时从来不谈政治问题，只是快临解放时，在关于学校南迁的问题上，我与他针锋相对地斗争过一次，结果他失败了。赖铤也是西北工学院的同事，他常和我谈政治问题，并且想拉我入国民党。但是因为他无法掩盖国民党贪污、腐化和无能的事实，他就无法改变我对国民党的厌恶，因而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我也曾劝他专门办教育，放弃搞国民党的工作，也没有为他接受。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他离开西北工学院往重庆，也就是我们最后分手的时候，他告诉了我要跟随着国民党走的哲学。他说他的人生哲学是“有权力支配人”（也就是骑在人的头上），唯其一般国民党的无能，才能表现他的有能，使他能达到他的目的。我回答说：“我的哲学是有权力

^①李书田为西北工学院筹备会主委，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解放前天津市委部的委员。

^②赖铤为西北工学院院长，为二陈派的著名骨干分子。

支配自然。”我们两个人的哲学不同，只好分道扬镳了。到一九四六年我路过南京时，他听说我的思想越来越左，就又找到我谈了半天，想说服我，我也努力说服他。他唯一的说词就是“国民党虽然不好，共产党也未见得不好。”我回答说：“国民党的不好是肯定的，共产党的好与不好却还待证，那末，好的希望至少还有一半！”我那时没有掌握更充足的事实和理论来回答得更好一些。从这次争辩以后，我们就完全断绝关系了。

以上就是我的简单的历史。我只把解放前与我的思想发展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历史背景约略地写出来了，其他的一般性的生活就没有提及。

二、我的几项主要思想认识的转变过程及其批判

1. 我对封建地主、蒋政权及帝国主义的认识

我小的时候认为地主就是有钱的人，“有钱就有势”，父亲这样教导着我，我也这样想。我恨地主张寿峰的一家，因为它曾欺侮了我的伯父和父亲；也恨我们下湾地主的儿子张昆生，因为他带头领导着一群小孩子欺侮我。至于其他的地主怎样欺侮旁人，我就不管了。为使自己免于被欺侮，我接受了父亲的教导，好好念书，以后能挣钱，“有钱就有势”，就没有人敢欺侮咱们了。那就是说要能反对某某地主，就除非自己也变成地主才成。

我到中学以后，个人逐渐走上了“学术”的道路，认为地主有钱无名，不知上下古今，是庸俗的一群。我就把做地主的梦逐渐淡忘了。

认识地主不仅是庸俗的一群，而是可耻的一个剥削阶级，“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是只有在解放后才得到的。解放以后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学习了历史唯物论，才知道从阶级观点来看所有的地主。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参加了四川的土地改革斗争，亲身访问了三百多家贫苦农民，看他们的遭遇较我伯父和父亲的遭遇有过之而无不及；看到四川地主勾结军阀、土匪、官僚、恶霸残酷压榨农民的事实，才认识到前面所引的刘少奇副主席的话是完全正确的。这时我才从思想上痛恨封建地主这整个阶级。

我起先讨厌蒋介石和国民党，因为他们贪污、不作正事。到美国后因遇事受美国人欺侮，就开始痛恨这个腐化、无能的统治集团。但我那时还认为国民党的腐化还只是少数品质恶劣的一些党棍的责任。要改正这种局面，实行一种“好人核心”政治就行。以为在当时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若有三个到十五个有能力、有办法、不要钱的“好人”出来作为“核心”，国民党的政治是可以搞好的。待后来见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在抗日期间，把装备最好的胡宗南军队留在后方，准备内战；而胜利后又把接收工作搞得一塌糊涂，并又破坏旧政协和发动内战等罪恶事实，才认为这个反动集团非打倒不可，自己才正式参加一些倒蒋的活动。

从阶级观点认识蒋介石反动派的本质是在解放以后，通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才逐渐明确起来。才知道它不光是少数品质恶劣的党棍的问题，甚至不完全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而是它整个代表了中囯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在华的势

力问题。要消灭中国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以及把帝国主义从中国的国土上赶出去，非打倒这个万恶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不可。这才使我从思想上根绝了对这个反动统治的任何可能的幻想。

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我开始也是比较肤浅的。认为帝国主义侵略旁的国家，是一些野心政客和它的大资本家的事，教会和其他的学术机关与它的侵略行径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很羡慕英美军队和商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但是对英美教会和它在中国办的学校则没有什么恶感。

解放以后，学习《帝国主义论》，逐渐能从阶级的本质和它的经济制度来看帝国主义，才认识到：我过去认为教会学校和它的学术机关与帝国主义无关，正是上了帝国主义的圈套。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干部学校”，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海关、邮政和洋行的买办人才，过去不正是为帝国主义服务吗？这才对我过去长期在教会学校念书，并曾在教会学校任教的历史，进一步有了正确的认识。

2. 个人主义思想的转变

我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我的教书生活，都是培养我个人主义的温床。伯父和父亲都是极端个人主义者，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靠得住，所以他们一向给我的教育就是“爷有不如娘有，娘有不如自己有”的格言，要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私塾的老师也是教我“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类的话。教会学校除灌输一些奴化教育外，特别显著的就是培养学生的超政治、超阶级、甚至超社会的个人主义的观点。我在沪江大学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了陶知行的一首格言：“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去干，靠人、靠天、靠祖先都不是好汉。”我认为很有道理，自己就是遵照这个格言行事的。

我选定了学校的教书生活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教书生活比较最自由，与人的关系最少，最能显出个人的本领，研究一点学问还可以显得清高。我的个人主义思想使我选定了这种职业，而这种职业也进一步地培养了我的个人主义思想。

解放初期，我常听到集体主义的宣传，我内心就有些抵触。认为集体的基础还是个人，只有个人好了，集体才能好。这当然是超社会的想法^①，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后来亲身受到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的教育，看到每一运动的胜利都是群众的力量，集体的力量，主要不是个人主义力量推动了集体，倒是集体的力量推动了个人，改造了个人。这样我的个人主义思想才一步一步地消失下去，开始感觉到放弃自我，为人民工作，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工作，比为个人工作，为个人的名利工作，真是要愉快得多。解放初期，当黄松龄部长要我担负北洋大学和教育局的行政工作时，我是勉强应允的，但内心总念念不忘我的“学术工作”。直到“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以后，经过几昼夜的斗争，才最后决定，以后一定要服从组织的调遣，毫不考虑个人；并在群众面前作了检讨，提出了保证。从此以后，我的精神就非常

^①在集体主义下，个人的努力还是重要的，但它的努力不能为个人而是为整个集体。

愉快，并立志要争取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

3. 我的世界观

我的个人主义思想，虽然曾是我接受马列主义阶级观点的障碍，但是通过解放后的学习，特别是几个大的运动所给我的教育，这个障碍是清除了。我不但承认社会主义的阶级性，并且深信阶级斗争是社会前进的动力。

但是我对马列主义的唯物观点就比较难以接受，有不少怀疑的地方。我上面曾说过我过去是喜欢哲学的。我跟很多资产阶级的物理学者一样，是走的二元论、唯心的道路。认为客观虽是存在的，但其“自体”是不可知的。人的认识是客观与主观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这个疑团，我长久思索，未能解开。直到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后，我花了四个来月的时间，重读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以及学习《译丛》上一些有关唯物论理文章，再结合我的科学知识，反复思考，才省悟到二元论的不可知论是错误的。人的认识固然要借助于主观的观察，这不等于说认识的结果一定要有主观的成分在内。在物的学中我们知道有的量是随坐标改变的，有的量是不随坐标改变的。坐标的改变就等于观察方法的改变。只要我们所认识的是客观存在的本质，是各方面观察结果推断的总和，它就是脱离人的认识而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认识一个桌子，除看它的形状、颜色、大小外，还可称它的重量和试它的坚实性等等，才能判断一个桌子是木制的，不是纸做的。若单凭颜色判断，则色盲的人与正常的人的认识当然有所不同，但若把所有可用的方法都结合起来，则“物自体”是可以认识的，而不为人的认识方法所改变的。这个事实可以从工业制造的实践中与科学预见的推证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若人的认识一定含有主观的成分在内，则工业上新的制造和科学上的推理之获得验证，是不可能的（最多也是偶然的事情）。其他的论证我就不谈了。是见二元论的唯心论是资产阶级的哲学，目的在想引出一个精神世界，维护上帝的地位。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旨，资本家的存在也是上帝的意旨。工人阶级当然不能革命了！我虽然好久以前就不信神，但却为二元论迷糊了很久。

4. 我对党的认识

解放以前，虽然我一向是同情共产党，但我对党是完全不认识的，我只是以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眼光看党。我以为党就是年青有为，想认真作事的一些人的组织。他们不贪污腐化，刻苦肯干，在我内心里引起了共鸣。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事迹，那种艰苦卓绝的精神，使我十分钦佩。至于共产党人为什么有这种精神，我则没有深入考虑过。只有一些唯心论的想法：以为世界上生下来就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好人，有的是坏人。国民党主要是坏人集团，共产党主要是好人集团，如此而已。

解放以后，通过形势的教育，通过一连串伟大运动的教育，以及个人在工作岗位中的体会，才对党逐渐有了明确的认识。认识党不光是好人集团，而且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在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领导、教育、锻炼起来的钢铁般的政治组织。党的事业就是要解放全中国，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要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由于我过去对党的认识不清，由于我的唯心论的思想障碍，由于我的严重个人主义思想的阻挠，虽然我曾经有几次想入党，却没有决心提出来。在解放初期我也想到，但恐怕有人说我投机，同时也怕入党以后不能再搞学术工作，我就没有提出来。参加西南土改以后，觉得自己对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的正确性有进一步的认识，也曾想提出入党的要求，但因为我对马列主义的唯物观点还有所怀疑，恐怕加入了党要讲这一问题，我没有法子讲清，所以我又犹疑了。同时想到我也负责天津民盟的工作，可以作党的助手，起一些桥梁作用也是需要的，因此就没提出来。最后在“三反”、思想改造过程中批判了我的个人主义思想，批判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深刻感到自己空虚、茫然、无所依据。因此，就感到非常苦闷。经王金鼎同志的启发，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深入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唯物观点，才最后扫除了我申请入党的障碍。

我现在决心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使我能得到进一步的改造，作一个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好学生和忠实信徒，为在祖国的土地上，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事业奋斗到底。

1953.1.22

李叔同年谱

朱经畲

一八八〇年庚辰（光绪六年） 一岁

十月廿三日（农历九月廿日）李叔同生于天津。名文涛，又名广涛，字叔同，又号漱筒。

祖籍浙江平湖。祖父寄籍津沽，经营盐业和银钱业。父名世珍，字筱楼。筱楼有三子。嫡出长子名文锦，早年夭折。庶出次子文熙，字桐岗，又字敬甫，先天羸弱，因恐其不寿，复纳侧室王氏，即叔同生母。叔同在其兄弟中行三，出生时父年已六十八，母王氏年仅二十余。

一八八四年甲申（光绪十年） 五岁

九月廿三日（农历八月初五日），父筱楼病故，卒年七十二岁。

叔同幼聪慧。是岁开始，从生母王氏习诵名诗格言。

一八八五年乙酉（光绪十一年） 六岁

从仲兄文熙（长叔同十二岁）受启蒙教育。至转年，学《百孝经》、《近性篇》、《格言连璧》等书。又读《文选》，能琅琅成诵，人多异之。

一八八七年丁亥（光绪十三年） 八岁

有王孝廉者，曾到普陀山出家，返津后居无量庵。叔同的大侄媳早寡，向王孝廉学《大悲咒》、《往生咒》等，叔同常旁听，不久也能背诵。

是年，从常云庄受业。两年间，读《孝经》、《毛诗》、《唐诗》、《千家诗》等。

一八八九年己丑（光绪十五年） 十岁

始读《四书》、《古文观止》，并临摹篆帖。此后四年间，略习训诂之学，读《尔雅》，并喜好《说文解字》。

一八九四年甲午（光绪二十年） 十五岁

读《左传》、《史记》、《汉书》等史书，并仍致力篆书，小楷。摹刘墀所临的《文徵明心经》甚久。事吟咏，有“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之句。

一八九五年乙未（光绪二十一年） 十六岁

此后两年间，从天津赵元礼（幼梅）学词。喜读五代词，尤爱王维诗。又从唐静严（一作静岩）学篆书及刻石，对金石之学，寝寝日上。兼习八股，文理清秀。结交天津艺林名士孟广慧、王吟笙、陈霭洲等，故对诗词、文章、书法、篆刻等，更有精进。

一八九七年丁酉（光绪二十三年） 十八岁

叔同与俞氏结婚。俞氏家族在津经营茶叶行。

一八九八年戊戌（光緒二十四年） 十九岁

是年，清光緒采納維新，下詔定國是。李叔同亦有“老大中華，非變法無以自存”之感，贊同康梁變法，並刻“南海康君是吾師”印章以明志。其後變法失敗，康梁逃往國外。叔同因受康黨之嫌，乃奉母携眷，避禍上海。初賃居于上海法租界卜鄰里。不久，即加入“城南文社”。

“城南文社”是上海寶山名士袁希濂、崑山詩人許幻園、儲醫蔡小香、江陰書家張小樓等，本以文會友之旨，于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成立的，地点在南市青龙桥之“城南草堂”。每月会课一次，以资切磋。叔同以弱冠之年，所作诗文词赋为社之冠。书法深得汉魏六朝之秘，篆书石刻亦佳，于上海文坛，初露头角。并与袁、许、蔡、张等。结拜金兰，号称“天涯五友”。

一八九九年己亥（光緒二十五年） 二十岁

春，迁居许幻园家的“城南草堂”。住房旁有小溪，跨溪有苍痕苍古的金洞桥，桥畔有两株两抱大的柳树，很是幽静。是年，作《二十自述诗》。

一九〇〇年庚子（光緒二十六年） 二十一岁

农历正月，作《二十自述诗序》。序为：“堕地苦晚，又婴尘劳，木替草荣，驹隙一瞬，俯仰之间，岁已弱冠。回思曩事，恍如昨晨，欣戚无端，抑郁谁语。爰托毫素，取志遗踪。旅邸寒灯，光仅如豆。成之一夕，不事雕刻。官属心声，乃多哀怨。江关庾信，花鸟杜陵，为湖前贤，益增惭恧。凡属知我，庶几谅予。庚子正月。”

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陷津京。值此家国沦陷，叔同在诗文中发出“世界鱼龙混，天心何不平”的呼声。

农历九月，长子李准生。

十二月，辑所作诗为《李庐诗钟》。序文云：“素居无俚，久不托音。短檠夜明，遂多羁绪。又值变乱，家国沦陷。山邱华屋，风闻声咽，天地顿隘，啼笑胥乖。乃以余间，滥竿文社，辄取两事，纂为陋句。空梁落燕，庭草无人。隻句珍异，有愧曷哲。岁月既久，积债浸繁，覆瓿摧薪，意有未忍。用付剞劂，就正通人，技类雕虫，将毋齿冷，赐之斧削，有深企焉。庚子嘉平月。”

一九〇一年辛丑（光緒二十七年） 二十二岁

三月，叔同与常熟乌目山僧黄仰宗，上海名画家任伯年，书法家高邕之等设立“上海书画公会”，每月出书画报一张。

先后在上海的戏院粉墨登场，演出“黄天霸”、“蝴蝶庙”、“白水滩”等。因他当年在天津读书之余，兼习艺事，故能在上海演出。他在词中说这是“泥他粉墨登场地，领略那英雄器宇，秋娘情味。”他曾与著名秦腔女演员杨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谢秋云辈，以艺事相往还，高山流水，志在赏音。后在一九〇四年甲辰所作《金缕曲》赠歌郎金娃娃的词中，抒发当时抑郁心怀：“雏凤声清清几许？销尽填胸荡气。笑我布衣而已；奔走天涯无事，问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又如赠名妓谢秋云诗中有句“冰蚕丝尽心先死，故国天寒梦不春。眼界大千皆泪海，为谁惆怅为谁颦。”亦属忧愤之作。看来，他走马舞台，厮磨金粉，寄情声色，正是为了“奔走天涯无一事”而

徬徨苦闷，内心充满抑郁痛苦的表现。

这一年，叔同还将其所藏名刻与自己所刻印章，编为《李庐印谱》，并为之序。

秋，叔同奉母命入南洋公学攻读，改名成蹊，字广平，读经济特科(特班)，与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等人同为蔡元培门生。时蔡任总教习。学员学习，按所学的书目阅读，每日写学习札记，每月命题作文一篇，札记与作文均由蔡氏手自批改。有时召学员谈话，令自述学习心得或时事感想。劝学员习日文，蔡氏亲自教授。其教导重心在于灌输爱国思想。叔同在学习期间，受益匪浅，也是他生活中的一个转变。

一九〇二年壬寅(光緒二十八年) 二十三岁

是年，各省补行庚子科乡试。叔同应浙江乡试，不第。仍回南洋公学继续攻读。课余之暇，并担任某报笔政。

一九〇四年甲辰(光緒三十年) 二十五岁

叔同毕业于南洋公学。与穆瑟斋等在上海市组设“沪学会”，宣传移风易俗，讲究卫生，广开风气；并提倡办学堂，培养人才，冀使国家独立富强。

农历十一月初三，次子李端生。

一九〇五年乙巳(光緒三十一年) 二十六岁

秋，叔同生母王氏逝于“城南草堂”。后来他回忆说：“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还只四十几岁！”他还说：“我从二十岁至二十六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见丰子恺的《法味》)母亲故后，运灵回津安葬。他感“破碎山河谁收拾？”为求救国之道，自费东渡日本求学。^①(一说李叔同留学日本，系端方以官费派遣。见郑逸梅《南社丛谈·李叔同传》)行前填词《金缕曲》，词的下片“……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表达了他的爱国热忱。

叔同抵东京，入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学习欧西绘画，并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我国留日专攻艺术者，以叔同为第一人。在校成绩辄冠侪辈。

此时叔同的生活大大改变，剪去发辮，改为中分式的短发，脱去长袍马褂，改穿西装。一变而为风流潇洒的青年。

十月，与友人议创《美术杂志》，内有音乐部分，规模已具。但在十一月，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内閣文部省徇清公使要求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以为有辱国体，全体罢课，有二百余留日学生纷纷归国，同意兴办《美术杂志》的人们星散。叔同留居东京，以个人之力，先拟办《音乐小杂志》，年可二册，春秋刊行。

一九〇六年丙午(光緒三十二年) 二十七岁

正月，李叔同在东京作《音乐小杂志序》。其文曰：“闲庭春浅，疏梅半开，朝曦上

^①：据载，二十世纪初几年，中国学生的留日活动出现热潮，并且人数逐年增加，一九〇二年四五五百名，一九〇三年达一千人，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达到最高峰，人数有八千人左右。(见日人实藤惠秀：《中国日本留学史》一九七〇年版十五页)

衣，软风入媚。流莺三五，隔树乱啼；乳燕一双，依人学语，上下宛转，有若互答。其音清脆，悦魄荡心。……又若登高山，临巨流，海鸟长啼，天风振袖，奔涛怒吼，更相逐搏，砰磅訇磕，谷震山鸣。懦夫丧魄而不敢前，壮士奋袂以兴起。呜呼！声音之道，感人深矣。唯彼声音，全出天然，若夫人为，既有音乐。……史家所闻，实祖印度，埃及传之，稍事制作，逮及希腊，乃有定名。……迄于今兹，发达益烈。……欧美风靡，亚东影从。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哉？乙巳十月，同议创《美术杂志》，音乐隶焉。乃规模粗具，风潮突起，同人星散，瓦解势成。不佞留滞东京，……爰以个人绵力，先刊《音乐小杂志》，饷我学界，……大雅宏达，不弃鄙陋，有以启之，所深幸也。……”是年，他主编了几期，在日本印刷后，寄到上海发行。

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

在日本戏剧家藤泽浅二郎的帮助下，叔同与曾孝谷、吴我尊等发起组织文艺话剧团体“春柳社”。

一九〇七年丁未（光緒三十三年） 二十八岁

春，“春柳社”在东京神田区青年会（一说在骏河台中国青年会）举行赈灾文艺会，演出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第三幕。叔同以“息霜”之名，饰演主角茶花女。此次演出，开中国话剧运动的先河。

夏，叔同和欧阳予倩等参加话剧《黑奴吁天录》的演出，反对种族压迫。演出博得好评。此后，还有曾孝谷，李涛痕、吴我尊和谢抗白等和他们一起从事话剧活动。

一九一〇年庚戌（宣统二年） 三十一岁

叔同自日本学成回国，任天津的直隶模范工业学堂图画教习。

一九一一年辛亥（宣统三年） 三十二岁

袁希濂到津任法曹，和叔同欢晤。袁是叔同在上海的结拜弟兄，一九〇四年留学日本东京政法大学，后到津任法曹。袁在以后的回忆中说，叔同家在天津某国（奥国）租界，夏屋渠渠，门首有“进士第”匾额，曾饭于其家。

是年初，家庭破产，一倒于义善源票号五十余万元，再倒于源丰润票号亦数十万元。

叔同复至上海，任城东女学音乐教习。三月，加入“南社”。与柳亚子、苏曼殊等用诗文宣扬民族主义思想，提倡民族气节，以文学鼓吹革命。

十月十日（农历八月十九）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叔同极为兴奋，填词《满江红》。中有“双手裂开腥鼠胆，寸金铸成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等句。对中国的未来，抱有无限希望。

一九一二年壬子（民国元年） 三十三岁

一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二月，清帝退位。三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同年春，陈其美，叶楚傖等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报》，柳亚子等主笔政，叔同任文艺广告编辑，又主编副刊画报。与柳亚子等创办“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刊印会员所作书画印章拓本，在内部传观。六月，《太平洋报》负债停刊，“文美社”解

散，《文美杂志》停刊。

七月，叔同到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图画和音乐教师。

一九一三到一九一四年 继续在杭州任职，配词作曲，如《忆儿时》、《早秋》、《送别》等歌词，配曲教唱；热心从事艺术教育。所著诗词，以“天津李凡息庸”的署名刊于《南社》书刊中。

老友袁希濂调任浙江法曹，再得与叔同时常聚首。

一九一五年乙卯(民国四年) 三十六岁

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图画课，时常往返杭宁之间。假日组织“宁社”，借佛寺陈列古书，字画，金石。

是年，袁世凯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并复辟称帝，国事日非。叔同在辛亥革命时期希望祖国昌盛的理想破灭了。他开始阅读宋元理学和道家的书，自称“欣欣道人”，也有更伤感忧时之作，如《落花》、《月》等。

一九一六年丙辰(民国五年) 三十七岁

这一年，夏丏尊从一册日本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一种体育方法，古人如释迦牟尼和耶稣，都曾断过食。叔同将这册杂志借去看过，就在冬季寒假期间，独自去杭州虎跑大慈寺试验断食三星期。第一周逐渐断食至尽，第二周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周由粥渐渐增至常量。断食归来以后，李叔同自书“灵化”二字，并附注：“丙辰新嘉年，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书此奉献典仁弟，以为纪念。欣欣道人李倣偈。”

一九一七年丁巳(民国六年) 三十八岁

春节期间，叔同未回上海，到杭州跑虎寺过年。正月初八，见理学家马一浮的朋友彭逊之(别署业东破佛，释号安忍)在这里出家后，叔同目睹一切，因受居七戒。返校后，开始素食，拜佛，诵经。

一九一八年戊午(民国七年) 三十九岁

暑假期间，叔同入虎跑大慈寺削发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出家前，他将一切书籍字画衣物，分赠给朋友和学生，并将其所雕金石封于西冷印社的石壁之中，刊“印藏”两字于壁上。行前，与其最亲近的弟子丰子恺、刘质平合影留念。

叔同有妻及二子，久居天津，他决心出家，事前并未告知。其留日携归的日姬，居上海，托友贻遣。日姬求一见亦不可得，绕屋啼哭而去。

九、十月间，去嘉兴精严寺藏经阁检理藏经。

(关于叔同出家的详情，曠月在一文中说：“民国七年，师年三十九，值暑假，语相契者曰：‘余明日入山，相聚只今夕，公等幸各自爱。’众度其意不可挽，相对法然。忽一友问曰：‘吾果何所为而出家乎？’曰：‘无所为。’曰：‘忍抛骨肉耶？’曰：‘人事无常，如暴病而死，欲不抛又安可得？’翌日破晓，遂孑然长往矣。一校役名闻玉者送师至寺。师易缁衣后，尊闻玉居上，遶之坐。师自扫除居室，玉欲代之，不可。师自支板为床，玉欲代之亦不可。玉泣不可仰，师慰令返校，玉徘徊不忍去，迟之又久，乃痛哭而回。戊午七月十三日，师于虎跑大慈寺，礼了悟和尚为剃度师，正式落

发，法名演音，字弘一。”（姜丹书亦有文记述此事，但说受戒是在灵隐寺。）

一九二〇年庚申（民国九年） 四十一岁

大师居新城（一名新登，今属浙江富阳）贝山，借到《弘教律藏》三帙，并求得《南山戒疏》和《羯磨疏》等，开始修订南山律宗。

一九二一年辛酉（民国十年） 四十二岁

大师居温州永宁下寮（庆福寺），完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此书厘订原有戒律，制为表解，更易于领会。稿为大师精书，后由民族工业资本家穆藕初捐七百元，委中华书局缩本影印千部，分赠各寺院，以淑僧界。

一九二四年甲子（民国十三年） 四十五岁

大师从温州到宁波，准备经南京往安徽九华山，因江浙开战，在宁波七塔寺落褫。在春晖中学任教的夏丏尊邀往白马湖春社小住。

一九二六年丙寅（民国十五年） 四十七岁

暮春，大师从温州到杭州招贤寺。丰子恺得信后，约夏丏尊同由上海去杭看望大师。

暑假，大师住上海南门灵山寺，同弘伞法师（原名程中和，二次革命时一团长）同访丰子恺。其间，重访青龙桥“城南草堂”，丰子恺随行。

大师重访“城南草堂”事，姜丹书在一文中说：“子恺随行，至则故居犹存，而主人已易，草堂改为宿舍（名超尘），入则大动今昔之悲，顿向佛座五体投地，叩头如捣蒜。肃穆之容，万籁为寂；凄凉之色，四壁浸寒。我佛有灵，当亦下伤心之泪矣！既知屋已易人，乃求故主何在。心诚求，其人斯得。嗟夫苍天！畴昔慷慨好义之文坛盟主许幻园者，头已白，耳已聩，憔悴之状不忍目，而犹伏处陋室，为人幄书，藉易升斗，以维持生活。相接之下，又复大恸。久之，始破涕为笑，追述前尘，恍如痴人说梦。此情此景，陪坐之子恺亦不禁涕之沾髭也。”丰子恺在《法味》一文中，也详述此次陪同寻访“城南草堂”的经过。

老友袁希濂约张小楼和许幻园同访大师，四人摄影留念（时蔡小香已故），大师亲笔题跋其上。

大师并弘伞法师乘轮去江西庐山，参加道场。

一九二七年丁卯（民国十六年） 四十八岁

大师住杭州吴山常寂寺。春，北伐军打到杭州，大师找到军中的学生共产党员宣中华等，交谈关于保护寺院问题。三月十七日，又致函给蔡元培，提出对佛教改革的建议。

秋，大师云游上海，叶圣陶、周予同、李石岑和日人内山完造等托夏丏尊相约，摆斋宴于功德林欢迎大师。宴后又随大师会见印光法师。事后，叶圣陶有《两法师》一文，记述此次相会的经过。

与《理想中人》作者，基督徒谢颂羔相会。丰子恺有题为《缘》的文章记此事。

拟赴暹罗（今泰国）行脚。过厦门时，因故留居闽南。与性显法师相契，初居太平岩，后移小雪峰（在南安），点《南山钞记》毕，赴泉州，又至永嘉。（一说大师因病居普陀寺，又由南安小雪峰回温州。）

一九二八年戊辰（民国十七年） 四十九岁

秋，由温州到上海，住丰子恺家。度丰子恺皈依佛门，法名“婴行”。为祝大师五十寿，议定出《护生画初集》，由丰子恺作画五十幅，大师为画写诗。

一九二九年己巳（民国十八年） 五十岁

挚友夏丏尊，经子恺（亭颀）和学生丰子恺，刘质平等七人，为大师在上虞白湖新建房三间。大师为屋命名为“晚晴山房”。为祝贺大师五十诞辰，有人买水族动物放生。夏丏尊集大师在俗所临各种碑帖，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李慈菴临古法书》。

通过日人内山完造，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二十五本转赠日本著名寺院和大学。其后常有来索取的，前后共寄送了一百七十部。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一九三〇庚午（民国十九年） 五十一岁

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发现古刻本《华严疏论纂要》，大师主持翻印二十五部。

三月，至泉州承天寺，居三个月，赴永嘉。六月，居白湖晚晴山房，检天津刻经处所刊《南山钞记》，评阅圈点。秋，居白湖金仙寺，讲经听经。在听天台权法师讲《地藏经》《弥陀要解》，从经义演绎到孝思在中国伦理学上的重要时，弘一大师当众哽咽泣涕如雨，后来才知道是他追念母爱的天性流露。冬，归永嘉的城下寮。

一九三一年辛未（民国二十年） 五十二岁

在白马湖法戒寺，发愿专学南山律。

是年，将印出的《华严经疏论纂要》十二部，又通过内山完造赠与日本东京帝大等十二处。另外还有大师亲自用硃笔圈点的一部，由内山完造携回日本赠与西京市外黄蘗山万福寺。

秋，交弟子刘质平（音乐家）《清凉歌曲》一集，内有清凉歌、山色歌、花香歌、世梦歌、观心歌五首。清词丽曲，是他出家后对祖国音乐的一次贡献。

想在离白马湖十五里的五磊寺筹办南山律学院，未果。

一九三三年癸酉（民国二十二年） 五十四岁

四月，于南安潘山发现唐末诗人韩偓的墓道，后又由同行的高文显君发现韩偓的遗诗一首，大师甚喜。

腊月，在泉州城南草庵寺度岁。为草庵作联一付：“草薶不除，时觉眼前生意满。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一九三五年乙亥（民国二十四年） 五十六岁

春，在泉州开元寺讲《一梦漫言》。入惠州安净峰过夏。十月，应承天戒期讲《律学要略》。不久，大病，住草庵寺休养。

嘱夏丏尊在开明书店再版《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书后并印有《南山律苑丛书》出版预告。内容有：1.行事钞资持记表解；2.行事钞资持记扶桑集释；3.比丘尼钞集解；4.含注戒本随讲别录；5.删补随机羯磨随讲别录；6.删定僧戒略解；7.羯磨略义；8.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习解；9.南山律在家备览；10.南山律在家备览略本；11.南山律宗传承史；12.南山律宗书目提要；13.南山大师撰集时代略讲附修学遗事；14.六物图解集解；15.南山律苑文集。以上均为大师所拟著述的。

一九三六年丙子（民国二十五年） 五十七岁

为厦门市第一次运动会谱曲作词。词为：“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国旗遍飘扬。健儿身手，各显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狡猾！请大家想想，切莫徬徨。”

一九三七年丁丑（民国二十六年） 五十八岁

二月十六日，在厦门南普陀寺讲《南闽十年之梦影》时，说自己的自号“二一老人”，是取“一事无成人渐老”和“一钱不值何消说”之意。

三月，应青岛湛山寺之约，前往讲律。“七七”事变后，于八月由青岛南返。经上海，在日机的狂炸下，居沪两日，返回厦门。

大师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极为愤慨。他说：“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支狗子！”他在厦门自题居室为“殉教堂”。并到处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

一九三八年戊寅（民国二十七年） 五十九岁

厦门陷敌前四日到漳州。秋到安海讲佛，成《安海法音录》一册。丰子恺邀大师去桂林，未果。复信称：“朽人年来老态日增，不久即将往生极乐。尽力弘法，犹如夕阳，殷红绚彩。随即西沉。……”

一九三九年己卯（民国二十八年） 六十岁

大师居泉州，度六十寿辰。柳亚子为赋两绝：“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迹异心岂殊。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大师亦报柳亚子一诗。诗为：“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大师其他友好，也有贺诗祝寿。

丰子恺作成《护国画集》六十幅为大师寿，自广西宜山寄泉州。翌年出版。其他弟子印《金刚经》及《九华垂迹图赞》。

澳门《觉音月刊》与上海《佛学半月刊》均出专刊祝寿。

一九四〇年庚辰（民国二十九年） 六十一岁

夏，大师在泉州福林寺闭关，著《南山律在家备览》。冬，《备览》第一集《宗体篇》精写稿本完成。一年后出《觉有情》半月刊分期刊载。

一九四一年辛巳（民国三十年） 六十二岁

是年在福林寺誓志念佛，不欲再出。

一九四二年壬午（民国三十一年） 六十三岁

春，大师应惠安石县长之请，赴灵瑞山讲经。四月，回百愿寺，旋应叶青眼居士等延住温陵养老院。七月二十一日，教众演出家剃头仪式，并开示出家人要自尊人格，争佛体面。

阴历八月十五、十六两日，为众讲《八大人觉经》后，即感精神不振。同时仍为晋江中学学生写中堂百余幅。二十三日渐示微疾，然力拒医药及探问，一心念佛。二十七日，完全断食，只饮开水。因约期已至，犹勉强为人作书。二十八日下午，自写遗嘱：“余于未命终前，临命终时，既命终后，皆托妙莲师一人负责。他人无论何人，不得干预。”并盖私章。九月初一下午，书“悲欣交集”一纸交妙莲师。此为大师最后墨宝。至初四日晚七时三刻，安祥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

大师在临终前几日，曾给挚友夏写荐赋二偈，偈为：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征求意见稿）

附：夏丐尊悼大师挽联

“垂涅槃赋偈相诀，旧雨难忘，热情应啸溪虎。
许娑婆乘愿再来，伊人宛在，长空但观夕阳。”

叶圣陶诗赞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其谢与缺，固非自然。
至人参化，以入涅槃，此境胜美，亦质亦玄。
悲欣交集，遂与世绝，悲见有情，欣证禅悦。
一贯真俗，体无差别。嗟哉法师，不可言说。”

赵朴初纪念弘一大师诞生一百周年献词

“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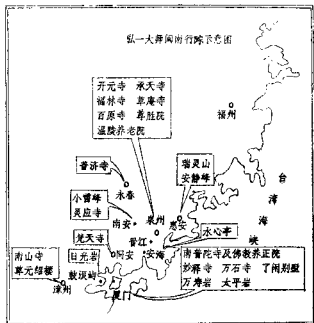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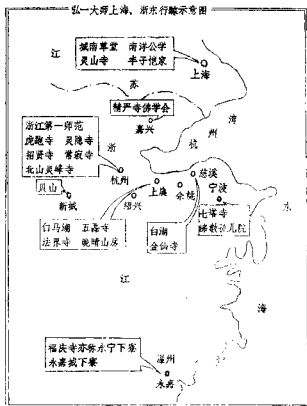
啸月和尚回忆大师

“师尚质朴，绝虚文，不苟循时宜；注经论，缙戒律；甘澹泊，守枯寂，不受丛林桎梏；律己严，治学勤，绳墨自守，无微不至。云游四方，一衲一钵，赤足露顶，不与俗伍。道貌清癯，而精神充沛；望之若孤云野鹤，萧然物外，动止安详，威仪寂静，高占平实。……一领衲衣，补钉二百二十四处（存经子渊字亨颐处），青灰相间，襤褷不堪，初出家时之物也。二十六年来（注：自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二，为二十五年），未尝一易。生平不乐名闻，不受供养，不蓄徒众，不作主持；虽声望日隆，而退抑弥甚，自责弥严，习劳习俭。洒扫浣濯，垂老躬行。所到之处，惟以律部注疏自随，见地高远，不随俗僧窠臼。”

僧睿论大师复兴南山律宗

“律宗自唐南山宣祖中兴，至南宋灵芝照祖继兴，历元明清计七百余年，虽代有提倡，然已失南山真脉。缘此时三大部已亡于扶桑。至清末徐蔚如居士复自扶桑请归，重刊于天津刻经处。然错误遗漏特多，令研者皆望涯而退。师发愿毕生精研戒法，誓护南山律宗。遍考中外律丛，校正三大部及其他律藏。二十年来，几无日不在律藏中探讨精微，发扬深显。务期戒律一藏，大著僧海，普及四众。宏法遍海内，而以闽南为最久。著作等身，而以写字结缘为最广。生平以德胜威，克己复礼。利人无微不至，处事一丝不苟。俭朴惜福，世罕其匹。每对学者谈及佛法式微，世风日下，未尝不痛哭流涕而不自己。常抱殉教之志，发愿重来度生。一生最崇拜印光法师，故亦效大师之风，不收徒众，不主寺刹。一领破衲，落落自处，仍与初出家时无以异也。宝筏西去，群伦失依矣。”

附：弘一大师上海、浙东、闽南行踪示意图



附：参考书目

- 《李叔同事略》 郑逸梅（《南社丛谈》）
《李叔同》 熊尚厚（《民国人物传》第三卷）
《弘一大师传》 姜丹书（《弘一大师永怀录》）
《弘一大师传》 僧睿 （同上）
《弘一大师传》 啸月 （同上）
《弘一大师的生平》 高文显 （同上）
《弘一大师之出家》 夏丏尊 （同上）
《怀晚晴老人》 夏丏尊 （同上）
《子恺漫画序》 夏丏尊 （同上）
《弘一大师的遗书》 夏丏尊 （同上）
《两法师》 叶圣陶 （同上）
《余与大师之关系》 袁希濂 （同上）
《弘一大师在白湖》 亦幻 （同上）
《去去就来》 李圆净 （同上）
《弘一律师》 内山完造 （同上）
《缘》 丰子恺 （同上）
《法味》 丰子恺 （同上）
《一代艺术大师李叔同（弘一法师）》陈珍珍（《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李叔同——弘一法师的一生》龚作家 刘炎臣（《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
《丰子恺传》 潘文彦 胡治钧 丰陈宝等《新文学史料》

（更正：20页上图中的“余姚”，应为“余姚”；下图中的“尊元绍楼”应为“尊元经楼”。）

追忆先父李叔同事迹片断

李 端

我是李叔同(弘一法师,一八八〇—一九四二)的次子,一九〇四年生于上海,虚岁八十,已退休多年。当先父一九〇五年离家留学日本时,我在襁褓中;一九一〇年他学成回津,住一、二年后又再次离家时,我只有六、七岁。因我一生中 and 先父相聚的时间很短,当时自己年又小,知道的事情不多,故过去很少向人谈自己的先父和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事情。近几年来,国内报刊在纪念先父百岁诞辰和逝世四十年忌时,曾有一些专文评介他老人家的一生,阅后很获教益。考虑到这些评介对我家旧事,仍有不尽详实之处,因就自己所知道的部分片断,当作资料提供出来,以作为研究先父李叔同者的参考。是否有当,敬希指正。

我家原籍浙江平湖。曾祖父时,寄居天津,经营盐务和银钱业。传至我祖父世珍,字筱楼,曾考举过清朝进士,并当过吏部主事的官。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晚年,为我家财势最盛的时候。其一,我家在河东区粮店后街山西会馆南的那一处门前挂有“进士第”和过道总有一“文元”匾的宅院,就是他六十多岁后购置的。这处宅院,当时有前后两所住房,有同样长的两个跨院,并有一个小花园;隔着跨院和住房后边的胡同,还有一处房子。再有,他在六十多岁时还在住家附近的孙家胡同办了一个慈善机关“备济社”,赈济贫寒,施舍衣食,沾得了“粮店后街李善人”的誉名,以别于城里冰窖胡同的“李善人”。其二,据我们看门房的老人家张顺对我讲过,说我爷爷在世时,我家曾多次来过“镖”。这应该是我家干盐务的暴利,通过镖行从引地押运到津的。张顺老人说,来“镖”的时候,前门大开,成箱的财物卸在前边的柜房里,热热闹闹了。张顺老人家还为我学过来“镖”时镖行人喊“来——镖——了”的呼喊声音。在我幼小的时候,我对他所说的“镖”并不懂,还以为是我们小孩子们扔着玩的铁镖呢?

我的祖父是一八八五年他七十二岁时故去的,那时,我父亲才五岁。祖父生前,给我家起的堂名叫“存朴堂”,他并亲笔给写了一个堂匾。这个堂匾在我们大家庭分居前还有,金匾蓝字,高悬在前院的五间西房大客厅的正中。所以,当时也有人称我们家为“存朴堂李筱楼家”。

根据书刊的资料,外间一直认为我祖父一生前后有妻妾三人,其实,至少是四人。因为,我还有一位奶奶,她以后一直在我们李家,活了有七十多岁。

我祖父的嫡出长子名文锦，即我的大伯父，他是我的第一个奶奶生的。我的大伯父比我的父亲约长五十岁，但因为后代未传，故一家人很少谈起这一支长门。有的书刊上说我的大伯“夭亡”，并不确切。因为书刊上曾多次介绍过，说我父亲能从小就会背经文，是从一位屠孺念佛而又比他年长的侄媳处学来的。父亲的侄媳，当即是我的大嫂，也就是我的老保姆王妈妈以后曾对我说过的我家的“大少奶奶”。据此，我认为我的大伯曾结婚有子，他是在有子后死的。而我的这位侄子又婚后无嗣而亡。继世无人，故我的祖父才又纳次妻或妾，即我的第二位奶奶。

庶出次子名文熙，字桐岗，是我的二伯父，比我的父亲长十二岁。因他幼年羸弱，恐其不寿，故我的祖父才又纳侧室王氏，即我的亲祖母。

我的亲祖母比我的祖父小四十多岁，她在二十多岁时生下我的父亲，那时我祖父已六十八岁。先父名文涛，字叔同，活了六十三岁。先父为什么字“叔同”呢？最初，我以为可能是和其“仲兄桐岗”的字有关系。但又不尽然。因为，我的亲祖母是我祖父的第三房，先父在弟兄辈中，又排行第三，取“叔同”为字，有和“二房”、“仲兄”相同平等的意思，以为自己和为自己的母亲正名份。这样的理解的根据，是我从父亲的一种遗物的署名中悟化出来的。在我母亲的房中，一直放有先父从上海带回来的四个大皮箱，在白色的箱皮上，除印有“上洋制皮箱”的厂名图记外，还都有“李庶同制”的字样。“庶”“叔”同音并用，可见先父常以自己的庶出为苦，也进一步更能说明字“叔同”的深意。

三

先父幼从家学，十八岁时（虚岁，推为一八九七年，丁酉）和俞氏结婚。俞氏比我父亲长两岁，属虎。因为我父亲属龙，故我的老保姆王妈妈就说他们夫妻两人是“龙虎斗”的命相。俞氏是我的生母，她以后生了我们弟兄三人。因为我的亲大哥夭亡，故以后外间就说我们只有亲弟兄两人了。

我的外祖家是干茶叶行的，住在南运河边的西头芥园庙附近的青龙庙胡同。我母亲在她家行五，我还有一位六姨和一位三舅，她们姐弟三人是一母所生。三舅早亡。六姨是个瘫子，一生未嫁。五舅俞僦青，在南开中学当过庶务。六舅在侯家后开杂货铺，七舅在英商仁记洋行作事。

先父婚后的第二年是戊戌（一八九八年），于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失败后，先父即奉母携眷，南下到上海。现在知道，因当时先父曾刻过“南海康君是吾师”的私章，此行有涉嫌避祸的意思。但从前我的老保姆王妈妈对我讲，说我父亲当时的南下，是想从此后就在南方扎根立业，离开天津这个大家庭。但六、七年以后，我的亲奶奶王氏在上海病故，我的父亲才又扶灵携眷，带着全部家什，坐轮船返回天津，时在一九〇五年秋后。彼时，我和我的九哥李准都已降生，我正在襁褓中。据王妈妈在我们弟兄长大后对我们讲，说我九哥李准因在轮船上了海风，得了终生不治的哮喘病，每到冬天就犯，因而才结婚较晚。王妈妈还说，你们弟兄俩人的上边，还有一个“葫芦哥”。这个哥哥应该行八，乳名葫芦，降生后没活多久就夭亡了。

四

在上海的几年，是先父一生中自认为是最幸福的时候。在这里他读书求知，广交士林，为文结社，还参加了不少社会公益活动。他曾对他的弟子丰子恺说过：“我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以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对于我祖母在沪的病逝，先父也对别人讲过：“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还只四十几岁！”

我祖母的灵柩运回天津以后，我的二伯父借口我祖母是“外丧”，不能进旧宅的大门。为此，我的父亲不依，和我的二伯父闹的一仗。他们兄弟间的公开闹矛盾，这是第一次。经亲友调停说和，才让我祖母的灵柩进了旧宅，后即择日举殡，安葬在新开河边张兴庄以北的李氏祖塋内。

给我的祖母发丧以后，先父即于当年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济世之道。一九一〇年学成回津任教，但仅呆了一、二年，又南下上海，一去三十年，至死也未归来。

对于先父的这两次出走，我的老保姆王妈妈一直认为是“气”的。她以后对我和我的九哥李准讲：他们老弟俩不和，家中大权由二门你们大爷（即我的二伯父）把着，你们的爸爸是生气才走的！

现在我自己分析，先父一九〇五年末去日本时的出走，当然和对我祖母的丧发有关系。但先父的寻求救国之道，也是一个原因。至于辛亥（一九一一年）后的第二次南下，有可能又和家中的破产有关。因为在这一年，我们大家庭由我二伯父主持经营的义善源和源丰润两处票号，相继倒闭，损失数十万元（或近百万元），几乎破产。先父是在这种情况下出走的。

五

我非常感念我的“妈妈”——即我的老保姆王妈妈。现在每一提起这位老太太，我就要难过得流泪。她在我家劳动了一生，照顾和养护了我们这一支的祖孙三代人。

她是天津武清县王庆坨人，丈夫姓王，都称她为王妈妈。她来我家原是专门侍候我祖母王氏的。以后，又抱养大我父亲。先父一八九八年奉母携眷南下去上海时，辞掉了我母亲俞氏的陪房廖妈妈，而带着他的保姆王妈妈，和我们一家同行。在上海我们弟兄又都是由这位王妈妈看护的。一九〇五年北归以后，先父长期在外，先母又因为情爱，从未打过我们一次。而这位王妈妈和我们朝夕相处，照顾备至，代负了慈母和严父的责任。她打过我，是出于对我的爱和负责任。记得我已经上学了，因为淘气，没有对王妈妈讲，就和小同学偷着到老头火车站（现东站）附近的一处坑里去玩，一次是夏天到坑里撑船，一次是冬天到坑冰上摔“冰拍子”（冰床子）。找到以后，都被王妈妈打了一顿。她是怕我出了意外，四处找我不见，非常着急，才这样做的。我的母亲一直对我们弟兄讲，让我们尊称这位老太太为“妈妈”，而不能带王字。因为，当时我家称其它女仆，都是带上对方婆家的姓，即边妈妈、肖妈妈等。

妈妈在我家先后劳动了五十多年，到七十多岁时才离开的。一方面，是她的年岁大了，她的儿孙接她回去。一方面是她知道我们家的事情很多，二伯父那一门的人容不得她。故在我母亲和二伯父相继去世而大家庭又未分居之前，把她辞退了。她以后因为想念我们，一年后又来看我们一次，但二门中的人不让她住下，经过我们弟兄俩强求，才让她宿了一夜，转天就走了。自此以后，我们就未再见到这位“妈妈”。妈妈的儿子在农闲时作小生意，卖木制的靴子底，也到我们家来过。

现在回忆我的家庭旧事，有许多情况都是这位“妈妈”对我讲过的。以后，还有多处会谈到她老人家。

六

先父的出家，给我母亲的刺激很大。她为了打发无聊的日月，就到北马路龙亭后孙姓办的刺绣学校里学绣花，约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再以后，母亲在我们家里又找了位女伴，教她们绣花。但时间不长，就散班了。

我的母亲俞氏，性情软弱，缺乏斗争性。在我们大家庭里，受别人摆弄，二伯父那方面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自己的主见。在当时，她一个人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我母亲是一八七八年旧历八月间的生日，在我二十二岁的那一年正月初三故去，寿不足五十岁。

在我母亲故去以前，曾经请过水阁医院的大夫来看过。不记得大夫说她患的甚麽病。只记得大夫说这间房子很冷，不适于病人养病。那时，我们住在后院的三间南房里，住屋中只升一个炭火盆。限于当时大家庭的旧规矩，虽然市上已经有带烟筒的铁炉子，我们也不能买来生火。以后也未再请过大夫，我母亲就故去了。

在旧式的封建大家庭里，有很多不合理的事，在我们家中都有。我母亲病危以前，就只请过一次大夫，二伯父虽是名医，也不给诊治。而以后不久二伯父患重病时，三哥接他到当时北平的大医院医治，也是花大家庭的钱。

先母病故以后，家中曾给已经出家为僧的先父去信报丧，但未接到他的回信

七

我祖父故去时，先父只有五岁，我二伯父十七岁。这以后家务由谁掌管，不详细。在我记事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家庭一直由二伯父李桐岗当家主事。他除经营桐达钱号外，还通中医，为人治病。

我家旧居在现在粮店后街六十二号。大门坐东朝西，西房为上。桐达钱号就在进大门的五间东房倒座里，也叫做“柜房”。柜房的抱柱上挂有木制对联，上联是“桐”字起，下联是“达”字头，余联的字句现在已回忆不起来。这是个内局性质的钱铺或票号，显见是二伯父为主东，虽然名义上是大家庭的商号。具体负责的，是刘、郑两位掌柜，他们也是我们家的帐房先生。

二伯父是位中医，收脉礼也不少。外出看病，由李升拉包月车去。记得是近处一元，远处二、三元，过河到当时的英、法租界四元。以后又每元加一角车钱。但因食之

者众，我们这个大家庭逐渐中落，先后卖掉和出租一些房子，以维持生活。本来，我二伯父屋中的兄弟姐妹有的已经做事了，但收入都由自己支配，不交给大家庭公用。大家庭用他们的钱，算为暂借，以后还要归还。我的二伯父以后自己又单独在西头小梢子口一带购置了一处荒地，死后就葬在新茔。由此可见，他是另有积蓄的。

二伯父有二妻一妾。原配卢氏，生我二姐和三哥。继配姚氏，生我四姐、四哥、七哥、五姐。当姚氏故后，因需要有人扶持，就又另娶来一个丫头收房，算做姨奶奶。这位姨奶奶来后，我二伯父让这个女人吃“断生汤”，一辈子不再生养。她很早就白了头发，以后随我的七哥搬到北京去住，解放后曾回天津看过我们一次。这个不幸的妇女比我的年岁尚小，现在可能还在北京居住。

我的二伯父子女众多，但有的夭亡或过早死去了。按我们大家庭兄弟姐妹的排行次序，我的三姐、五哥、六哥都应该是他的孩子。再往上还应该有位大姐和二哥，但已不能推出是我的大伯父或二伯父的孩子，他们都未在世间活久。

八

先父第二次南下出走以后，开始和家中不断有书信往来，都是寄给我二伯父李桐岗的。从二伯父家中人的口里，说出先父在外地的行踪——在上海，在杭州，在南京，或者又到别的地方去了。后自己年岁渐长，清楚的记得见过先父来的两封信，这都是在给二伯父信中的另纸附信，没有称谓也没有签名。

第一封是先父出家以后寄来的，当时我正在中学上学。那一天，我们正在后院南屋的住房里吃饭，住在后院西屋的二伯父让人拿过一封先父的来信给我们看。信中说他出家去当和尚，让我们一家人也吃斋信佛，还嘱咐我们弟兄要用功读书，长大后在教育界作事。看到这封信时，我的母亲、九哥、王妈妈和我都哭了。记得这封信的信笺是在白纸上印有一个和尚坐在那里念经的图案——图案为赭石色。这是定印的信笺。现在回忆这副图案很像丰子恺的画笔，也可能是他们师生间共同商量后印制专用的。

我见到的第二封信，是在我的九嫂王氏第二胎生了一个男孩以后（第一胎生的是女孩），我们向先父报告家中添了的事，并求这位出家当了和尚的老人给他的孙子起个吉祥的名子。以后得到先父的回信，给他的孙子赐名“祖慈”。李祖慈在四十多年前随我的九哥李准等迁居北京，现在也五十多岁了。我九嫂在以后还生了一个女孩，我这两个侄女叫小安、小荣，不知道她们的学名。

九

在大家庭的弟兄中，我行十，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我的九哥李准，和我是亲弟兄。从我们兄弟俩的起名，能看出和二伯父屋中的亲叔伯弟兄间的不同。

二伯父有三男二女，即我的三哥麟玉（字圣章），四哥麟符（字相章），七哥麟玺（字晋章），四姐李谦，五姐李坤。本来，我们也应该以麟字排名，但二伯父没有这样办，而是让我们和四姐、五姐等接着排名。故九哥名李准，我名李端。

我的三哥李麟玉，是二伯父的原配卢氏伯母所生。他的三姨父是国民党元老中留法

的李石曾，故三哥在南开中学毕业后，能顺利的留学法国。回国后，于三十年代初曾一度在当时的北平任中法大学校长。我还有一位二姐也是芦氏伯母所生，后嫁给西头振德店黄家的一个孩子。

四哥、七哥，四姐、五姐，都是二伯父的继配姚氏伯母所生。四哥麟符，患羊角疯病，呆傻早亡。四嫂是清末翰林刘嘉琛的女儿，嫁后即常住娘家，只是在四哥故后带孝送丧，随即离开李家，靠教书过活。七哥麟堡，以后在英商汇丰银行作事，他也好书画篆刻，吃斋信佛，号雄河居士。七嫂金氏，西头大药王庙住家。他们夫妻没有儿女。四姐李谦，曾在我家附近吉家胡同的民立第一女子小学教书，结婚时年岁已经较大了。

十

河东地藏庵前陆家胡同的老宅现在已经认不清了，我幼年时曾随着家里的管事到那里去看过收房租。记得是东西房相对的院子。先父就是在陆家胡同的老宅降生的。以后，我祖父又购置了现在粮店后街的这一处大宅第，计有前后两个住宅，两个跨院，这四个院落呈“田”字形，当中还有一个小花园。大门朝东，西房为上。前门是现在的粮店后街六十二号，后门在邱家胡同。整套房子约为十间房长短相等的正正方形，共有近四十间房舍。

“田”字南面的前院住房是五间东屋柜房，五间西屋客厅，南北房各三间住人。后院是五间西房和南北房各三间住人，东房处是五间房长的游廊，直穿箭道、花园到跨院。跨院有三间房宽，东头三间东房是中书房，当中和西头共有两排三间西房，将长跨院分成两个。跨院和住房院当中是大门和门房共两间，正对着宽宽的箭道，用箭道隔开跨院和住房。在箭道的当中，就是小花园。花园里有一间西式建筑，我们叫它为“洋书房”，是先父留日回津以后在家中工作和待客的地方。

花园叫“意园”。前面有竹竿斜插成的菱形竹篱，八角门上挂着我祖父亲写的长方形小匾，步五级条石台阶上到砖台，就是“洋书房”。洋书房是刀把状的一间西屋，朝东朝南有窗。它通后院的游廊也通跨院的房庆厦，园中有修竹盆花，环境确是不错。玻璃门窗，西式木床书橱，格局也颇讲究。据说当时一些旧家富户，都要建一点“洋”式建筑，才算文明阔气。

先父从日本留学回津后，于课余之暇，经常在这间洋书房里工作和接待宾客。有一次我在前院玩，见父亲正送客人出门，我忙躲藏到门房里。客人走后，我问是谁，老人家张顺说是上海的许老爷，来了多次，还在洋书房里住过。现在查阅资料，知道这位应是父亲的盟友许幻园，青龙桥“城南草堂”的主人，在上海借房给我们住的名士。过去，都知道先父在上海的盟友袁希濂曾来过我家，对于许幻园的到过天津，是没有过记载的。

十一

约在我三十岁左右，我们大家庭分居；接着，我和我九哥李准也分开了。全部分家的时间，共约三、四年之久。分家时，我三哥和七哥请了大律师张士骏，九哥请了一位姓

杨的律师。另外，还请来了一位姓王的表兄居中调解。开始，我们主张对半分，但他们说要给长门留下一点，准备由别人“过继”。后又因为要另给我二伯父的姨奶奶争养费，结果是他们按五八分，我们按四二分。在此以前，因大家庭生活困难，陆家胡同老宅的一些房子先以七千块大洋卖掉，大家分款度日。以后，将后院和两个跨院分别出租，我们都挤到前院的十六间房子里住。分家时，这四个大宅院作价三万，前后院的两处好房分给三哥和七哥，“备济社”对过的一部分房子和水梯子王家店的房子并两所跨院分给我和九哥李准。另外，我还分到一张仇十洲的山水人物画——但这张名画因为要重算作我二伯父的那位丫头姨奶奶的“养费”，分家以后又被我七哥要回去了。我家原挂在客厅中的另一张画着一只大鹰的名画，也分给三哥和七哥了。

记得，我们的后院租给一位芦台人，跨院是分别租给林、李两姓，都又由旁边邱家胡同开偏门进出。早年，我们的故居临三岔河口，以后又是奥租界，是较好的住宅区。当时就有不少富户住在那里，如大口朱家、谦益号曹家和敦昌银号冯家，都是我们的老邻居。

十二

先父的遗物，我曾亲见过一些。但由于当时无知和以后的保管不善，全丢失了。

在先父由上海运来的大皮箱中，我见到一箱扇子和几枚图章。扇子有团扇折扇两种，都有书画，记得还有天津王新铭写的字。我们随便拿这些扇子扇着玩，以后都丢了。图章有四枚，两枚象牙章，一枚水晶章，一枚墨晶章。水晶章刻着“草笠”两字；椭圆形的墨晶章只刻了“吉羊”两字的细笔划，据说这是试刀，尚未刻字。两棵象牙章，一棵是顶端为小狮子狗，底面刻“铁石心肠”四字，由我九哥李准保存。另一棵是一个小葫芦形的章，在葫芦腰处可以拧开，下腰的正面是印泥盒，上腰的底面刻着“成蹊”两字，这是先父在上海时用过的私章。但以后这棵图章被我毁灭了。我先求人磨下“成蹊”二字，刻上“正夫”，随身携带，作为我在南开中学作事时名章；以后，在一次乘电车时被扒手连钱包一并窃去，丢失了。

先父有一个粘来往书信的本子，将来信的信笺和信封都粘在一起，有二、三寸厚的一摞，也没有保存住。他用的信笺信封，都是自己作的。信笺的图案，是当中刻着两个圆圈，形成连环的样子。信封是正当中刻着双钩的“李庐”两字；在左下角是“凭君传语”。发信的时候，在这四个字下面再添上日期。我见过印制这种信纸和信封图案的木制戳子，并曾自己也刷印使用过。这些木制戳子和印谱等都放在“洋书房”的书橱内，以后也散失了。

先父写的碑帖，我也见过一些。有一本是他书写的佛经字帖，两三段的一种字体，真、草、隶、篆都有，封皮兰色，上有白签，为“李总翁临帖”，又署名“一音”。另有只写着“南无阿弥陀佛”的横条幅，署名“铁臂”。

此外，我还见过父亲编的印谱，写的对联，和他用过的红丹帖（名片）。丹帖上有成蹊、广平的署名，是木刻字。

有些东西，包括我父母亲的生前照片和我们的分家单据，在十年动乱中又被我焚毁

了。

十三

先父从日本留学回津工作以后，在家里只呆了一两年，就又南下上海了。他在天津工作的这一两年里，我已经六、七岁，能记住一些事情了。我记得在此期间，他没有在天津度过一次春节。

每年过春节，我家都是由我的二伯父在大年三十夜先在佛堂和李氏宗祠这两处地方焚香磕头，以后相继的是我的三哥、四哥、七哥、九哥和我这几个晚辈男子跟着磕头，从不记得有我父亲参加。家中的佛堂在前院三间北房，即我那位奶奶住的外屋中，李氏宗祠在后院南房我们住的外间屋。记得磕头时我排在最后，因为是小小孩跟着前后院跑，忙忙的有时才磕两个头就起来追前边走的人，心里也是紧张害怕。但清楚地记得，过春节时从未见过有先父在内。

一九二二年的春节后不久就闹正月十四，曹锟的乱兵抢了北大关和估衣街一带地方。我们住的粮店后街因在奥租界内，没受影响。当时听到枪声，大人让我们都躺在炕上不许动。大人们出出进进，也不记得有我父亲。

我主要是想估计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根据资料，知先父从日本回国时曾携一日姬同归，住在上海。故很有可能他是在寒假期间南下，不在天津过春节，或已经离开了天津。

十四

我幼年时在粮店后街附近的行宫庙小学上学。中学是在两头铃铛阁上学。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我们受马骏等领导，查封日货，把北海楼商场里的日货弄出来烧。中学毕业后，我的三哥李麟玉托人给我找事，让我到一个制版厂当制铜版的学徒。我不愿意，没有去。因为先父在出家后曾来过信，让我长大后在教育界作事。又过了几年，因严范荪早年捐给南开大学的一百多箱藏书，需要找人整理，看有没有善本。经介绍，我到南大图书馆去查书，由一位姓张的人带着干，另外还有我们三名新手，共计四个人。当时，我以字为名，叫李正夫。

我在南开大学工作了一年，又调到南开中学图书馆当出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南开南迁时，我没有去。在天津赋闲八年，靠过去的一点储蓄和原配郑氏娘家的接济过活。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胜利以后，国民党接收天津，我考入当时的后勤部被服厂作事，改名李直卿，直到天津解放，继续在被服厂工作。

一九五三年前后，天津被服厂外迁，只有我所在的第二分厂的人留津分配。经过近一年的学习，我于一九五五年一月到化工站报到，任商品保管会计。一九七〇年退休。原配郑氏，没有生育，一九五二年病故。继配杜氏，生三个女儿，现在一起生活。

我除用过正夫、直卿两个名字外，又自号啸同，意在纪念先父，唤他回归。

回忆，不一定都很准确，若能找到我原住在北京后门一带亲属，或可能还会了解到一些资料。

（王慰增整理）

袁世凯与北洋军阀集团

徐景星

目 录

编写说明

- (一) 新建陆军——北洋军阀集团的胚胎
 - 1. 新建陆军是中国新式陆军的开端
 - 2. 督练处的组成与新军建制
 - 3. 新建陆军与戊戌政变
 - 4. 改编与扩编武卫右军
 - 5. 镇压山东义和团
- (二) 编练北洋常备军与统一全国军制
 - 1. 先编成北洋常备军左镇
 - 2. 练兵处集中军权
 - 3. 统一全国军制
 - 4. 北洋常备军的扩编和陆军六镇编成
 - 5. 北洋会操
- (三) 袁世凯窃夺政权 北洋军阀统治全国
 - 1. 北洋军阀占据北京政府
 - 2. 北洋军阀势力扩展到南方
 - 3. 北洋陆军的大举扩编
 - 4. 晋封将军与帝制封爵

编写说明

这份资料提供有关袁世凯一八九五年在小站督练新建陆军，一八九八年改编武卫右军，一九〇二年在保定督练北洋常备军，直到一九〇三——一九〇五年改编陆军六镇，形成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以及袁世凯凭借这支武装进行政治投机，窃夺政权，统治全国的简要综合情况，概述北洋军阀集团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

本文参考天津市政协的部分文史资料存稿，并参阅有关文献资料，综合编写。一九七七年一月作为《天津文史参考资料简辑》第十三辑，由天津市政协秘书处排印，在有限的范围内赠送参考。

一九八二年八月由作者修改。其中第二章第四节关于北洋常备军的扩编和陆军六镇的编成，是根据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恒俊同志的考证结果修改的。

清朝末年，袁世凯主持督练“新建陆军”。经过十年多的时间，为清王朝练成一支新式编制、新式装备和按照德、日操典训练的新式陆军；同时，也为袁世凯自己建立起一个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他紧紧抓住军队，施用种种阴谋手段，伺机窃夺政权。从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登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开始，到一九二七年北伐为止，北洋军阀统治中国达十六年。

清朝原来的军队，是满族、蒙古族和汉军的“八旗”以及主要由汉族人组成的“绿营”。^①随着清朝政府政治上的日益衰败，八旗和绿营已经腐朽不堪，不能发挥维护清朝统治的作用。

通过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曾国藩建立的“湘军”和李鸿章建立的“淮军”在地方团练的基础上发展为清朝政府的国家常备军。可是湘军和淮军同样是旧式军队，日益腐朽。甲午中日战争中，陆军节节溃退，海军全军覆灭。清朝政府为了支撑危局，决定建立一支新式军队。袁世凯训练的“新建陆军”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出现的。

早在一八六二年，淮军一部已改习洋枪、洋操。一八六五年，清朝政府又命三口通商大臣、兵部侍郎崇厚，率军一千五百人，赴京、津一带，进行洋操训练。以后恭亲王奕訢、直隶总督曾国藩先后提出用洋枪、洋操训练军队的计划。一八八三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一八八五年，又设立北洋武备学堂，训练出一批通晓外国军事知识的军官。但是，较大规模地采用德、日陆军规范训练新军，改革旧军，则是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

北洋军阀集团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也就是袁世凯个人的实力不断扩大、职位不断提高的过程。袁世凯正是依靠手中掌握了这支武装力量，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掌握了统治全中国的权力。

^① 八旗原是由满族人组成的军事组织，按黄、白、红、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种旗色区分。旗下辖几个参领，参领下辖几个佐领。以后又有“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建制。清政府所编的汉旗军队因用绿色的旗帜，故又称“绿营”。

（一）新建陆军——北洋军阀的胚胎

从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九年，袁世凯在天津南郊小站督练新建陆军。四年期间，粗具规模。这是中国有新式陆军的开端，也是袁世凯抓住军队，爬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序幕。祸害中国十余年的北洋军阀集困于此胚胎。

1. 新建陆军是中国新式陆军的开端

一八九四年冬天，清政府任命淮系官僚、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在天津小站训练“定武军”十营，聘德国人汉纳根为教习，按照德国操典进行训练。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李鸿藻推荐袁世凯接练洋枪队（即定武军）。袁奉命后，拟定了新建陆军“练兵要则”、“营制”、“饷章”与“聘请洋员合同”等呈报给督办军务处。十二月八日督办军务处的亲王奕訢、奕劻、大臣李鸿藻、翁同和、荣禄、长麟等联名写了奏折，保举袁世凯：

“……臣等公同商酌，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甚有声望；其所拟改练洋枪队办法及聘请洋员合同暨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均属周妥。相应请旨飭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先就定武十营步队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为根本，再加募步马各队，足七千人之数，即照该道所拟营制饷章编伍办理，每月约支正饷银七万余两。至应用洋教习洋员，由臣等咨会驻德公使迭商聘订。果能著有成效，尚拟逐渐扩充”。^①

奏折上去，随即得到光绪帝批准。上谕：

“……温处道袁世凯既经五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穷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懍之慎之！”^②

从此，袁世凯正式接任督练。

定武军原来的编制共四千七百五十人。袁世凯接任以后，于一八九六年一月，派副将吴长纯去淮、徐、齐、豫募兵二千二百五十人；派都司魏德清、千总王开福等去锦州、新民、昌图募骑兵三百人，扩充到七千三百人。^③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又添募新兵两千人，除补充各营外，在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增编辎重兵一营。

^① 徐一士：《一士谈荟》第103—104页。

^② 陈宝琛等奏稿，《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

^③ 袁世凯：《养寿园电稿》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致张之洞电及二十二日致奉天将军电。

袁世凯拟定的新建陆军的募兵标准、饷章、规制等，摘录如下：

一、格式

限二十岁至二十五岁，身高四尺八寸以上，力能托百斤，且每小时行走十里以外；

报明家口住址，取具邻右保结；素不安分，犯有前科，吸食鸦片，五官不整，体弱多病及有眼疾者，不收。

二、饷章

应募后，每日发口粮大钱一百文；

开差后，每日发口粮大钱一百五十文，头目及粗通文字者发大钱二百文；

到营后，正头目月饷五两五钱，副头目五两；正兵四两五钱，伙伙三两五钱，长伙三两。

三、规制

士兵在营三年，因事请假，给假三月，并发三月薪饷。遇有征调，概不准假，候征调完后再补。

上兵积劳成疾，或作战受伤，医局诊治给药，分等优赏，仍支原饷。在营病故，给埋葬银十两；阵亡，赏恤二年本饷。

四、律令（略）^①

新建陆军的装备一律是洋枪洋炮。一八九六年一月十四日袁世凯奏北京督办军务处的禀：

“王爷中堂大人钧鉴：凯陆军现用枪械稍杂，拟换用一律，增募新兵，亦须添械，除已领曼利夏枪一千余杆及各件外，仍请领曼利夏步枪五千四百杆，曼利夏马枪七百杆，六响手枪一千支，五十七密里格鲁森快炮四十尊，步官挂刀，及马兵挂刀各五百柄。以上各件，均系洋员汉纳根购到。乞电北洋照拨，以便领操。”^②

这支军队仿照德国陆军建制，按镇、协、标、营、队、排编成；具有步、骑、炮、工各兵种；严格选募士兵，提高了部队素质；由军事学堂出身，具有当代军事知识的人充任军官；经过比较严格的训练和演习，与旧军面貌完全不同，所以命名为“新建陆军”。是中国近代新式陆军的开端。

2. 督练处的组成与新军建制

新建陆军成立督练处，袁世凯自任督练。下设参谋、执法、督操三个营务处，以及中军、文案等官职。机构组成如下：

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

^①袁世凯辑，《新建陆军兵略稿存》。

^②袁世凯，《奏办四电稿》，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执法营务处总办王英楷；

督操营务处总办梁华殿，后由帮办冯国璋接替。

中军官（相当于副官长或侍卫长）张勋。

文案（相当于秘书）阮忠枢、沈祖宪、陈燕昌、肖凤文、田文烈、富敦源、吴钱孙。

此外，还设有粮饷局、军械局、军医局、教习处等机构。

另设步兵随营武备学堂，监督是冯国璋；炮队随营武备学堂，监督是段祺瑞；马队随营武备学堂，教习是挪威人曼德；工程队随营武备学堂，监督是王士珍；德文学堂，监督是景启。

所聘洋员有：

巴森斯，参赞营务兼教练事宜；

慕兴礼，德文教习；

伯罗恩，负责操场基本训练兼管枪械稽查；

曼德，负责骑兵教育；

祁开芬，负责炮兵教育；

魏贝尔，德文学堂总教习兼管全军礼节教育；

施璧士，操场稽查武员；

高士达，号兵总教习。

新建陆军的编制分为左右两翼（翼相当于旅），左翼步兵二营，炮兵一营；右翼步兵三营，骑兵一营，共七营。每营统带（相当于营长）一人，都统一人。步骑兵每营四队，炮兵三队（相当于连），每队设领官（相当于连长）一人。

新建陆军的主要军官如下：

左翼翼长姜桂题。

步兵第一营统带姜桂题兼，帮统陆建章、曹锟；前队领官叶长盛，后队领官吴金彪，左队领官戴金彪，右队领官张允泰；哨官（排长）有于富有和阎相文等。

步兵第二营统带段芝贵，帮统张锡奎；前队领官何宗莲，后队领官王占元，左队领官聂汝清，右队领官李天保。

炮兵第三营统带段祺瑞；

左翼重炮队领官商德全，右翼快炮队领官田中玉，过山炮队领官张怀芝。

右翼翼长龚元友。

步兵第一营统带龚元友兼，帮统刘承恩。

步兵第二营统带杨荣泰，帮统王金镜；前队领官马龙标，后队领官杨善德。

步兵第三营统带徐邦杰，帮统梁华殿；

工程营管带刘清春，后由王士珍接任；帮带卫兴武。领官赵国贤、雷震春、李长泰等。

骑兵第六营统带任永清；领官孟愿远、吴凤岭等。

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都是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冯国璋曾去过日本，段祺瑞曾去过德国考察，学习军事，都是当时具有一定近代军事知识的人，被袁世凯重用，成为他

的忠实爪牙。原定武军中的下级军官曹锟、卢永祥、段芝贵也被袁世凯提拔，委任领官、管带等职务。还有张勋、倪嗣冲等旧军人前来投靠，愿为袁世凯效劳卖命，袁都不遗余力地加以搜罗，这一批爪牙，就是北洋军阀集团最初拼凑的班底。从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九年，袁世凯在小站督练新建陆军，可以说是北洋军阀的胚胎时期。新建陆军实行“招募制”，实际上是虚佣制度。平日向士兵宣讲“经史大义”，宣扬“忠君”、“尽孝”等封建思想，灌输“袁大人是我们衣食父母，我们要为袁大人卖命”的思想，有的营房里还设立袁世凯的牌位，每天让士兵叩头行礼。同时用专制独裁的封建纪律严格管束士兵。这支新式武装仍然带有湘、淮军“兵为将有”的半私人军队的浓厚封建色彩。

3. 新建陆军与戊戌政变

早在一八九五年五月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进行变法的活动时，袁世凯正在督办军务处当差，他参加了康、梁发起的“强学会”。康有为写了一篇万言书，袁世凯曾为他代递督办军务处，以“荣禄不收”而被退回。^①

七月初，袁世凯同康有为、陈炽、丁立均、沈曾植、张孝谦等人一起开强学会，“即席约定，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②

袁世凯出任新建陆军督练，表面上是李鸿藻推荐，但荣禄却是实际上的“疏荐”人。^③所以在任命袁世凯的时候，倾向维新的军机大臣翁同龢并不同意。另一方面，袁世凯参加强学会，与康、梁等人接近这一点，顽固派也不完全放心。袁世凯上任不久，李鸿藻曾叫御史胡景桂出面参劾。^④

一八九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命兵部尚书、督办军务大臣荣禄，到天津查办。^⑤荣禄在小站看了新建陆军后，认为满意，作出了“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的决

①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记》。

②《渠村公先生年谱初稿》第26页，荣致夏曾估函：“……其年七月，京师强学会开会，发起者为南海先生，持之者为郎中陈炽，郎中沈曾植，徐修张孝谦，浙江温州道袁世凯等，余被推为会中书记员”。

又，九月二十一日荣致夏曾估函：“此间数日内，袁慰亭（袁世凯）陈令职诸人开一会议，集款已有两千（此指湘可通达官得多金），拟即为译书刻报地步，若翁成亦大律也”。

③《清史稿》卷443，荣禄传。

④荣禄上：《梦蕉亭杂记》：“甲午中日之役失败后，军务处五大臣鉴于陆军不足恃，改练新军。项城袁君世凯，以恩道立新建陆军督办。该军屯兵天津小站，于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5）冬成立。当奏派时，常熟（翁同龢）不甚谓然，高阳（李鸿藻）主之。即成立数数月，津门官绅颇有怨言，谓袁君办事操切，嗜杀专权，不受北洋大臣节制。高阳虽不护短，因系属僚，不能自转其说，乃讽同乡胡侍郎景桂撰拾多款参奏，奉旨命袁文忠公裕禄往查办”。

⑤《光绪朝实录》第389卷：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上谕：“前因天津新建陆军，特派袁世凯督练洋操，优给俸项，原冀蜕变一新，尽洗从前勇营习气。兹有入奏，恣说滥崇尚虚文，苛私独筑，性情诡妄，扰害一方一折。该员所练各军，惟图量入，必应切实操练，倘不虚心，方收实效。著袁禄随赴天津，将该员督练洋操一切情形详细查明，确指得力，原不准其作外间，毫无实际。其被参各节，悉否属实，一并平公确查，据实回奏。原着袁世凯查办”。

定。^①

根据荣禄的复奏，一八九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光绪帝发下一道谕旨：

“前据御史胡景桂奏袁世凯营私侵蚀各款，当经派荣禄驰往查办。兹根据查明覆奏，袁世凯被参各款均无实据，即着毋庸置议。

新建陆军督练洋操，为中国自强关键，必须办有成效，方可逐渐推广。袁世凯此次被参各款，虽经荣禄查明，尚无实据，惟此事关系重大，断不准徒饰外观，有名无实，为外人所窃笑。

袁世凯通经耐劳，于洋操情形亦尚熟悉，第恐任重志满，渐启矜张之习，总当存有则改之，无则勉之之心，以副委任。

至委员太多，则用费太滥，尤宜严加审择，勿涉虚靡。王文韶近在天津，该道（袁）必应随时禀商办理，该将（王）亦当就近认真考察，总期精益求精，悉成劲旅，俾御侮确有把握，用副朝廷实事求是至意”。^②

从这一番奏参的周折，可以看出，奏参，是一次警告，也是试探。通过这次查办，荣禄对袁世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又密切了一层，而查办的结果是“均无实据”，反倒受到表扬。一八九七年，提升袁世凯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一八九八年六月，光绪帝下“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实行新政不过一百天，受西太后和保守势力的强大压力，光绪帝在感到“位且不保”的危急时刻，给康有为、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人下了一道密诏，要他们“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当时，正在小站督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此时突然成为时局的关键人物。

袁世凯以强学会会员的关系，看到当时康、梁正在得势，曾派徐世昌到北京徐致靖（翰林院侍读学士）处活动。这时，康有为正想拉袁世凯到光绪帝一边来，借他这支七千人的新建陆军以对抗西太后。康有为一面派他的亲信弟子徐仁禄驻小站联络，一面写密奏向光绪帝推荐袁世凯，光绪帝即于九月十一日传谕召袁世凯：“来京陛见”。

九月十六日，光绪帝接见了袁世凯，赏以“候补侍郎”衔，派他专办练兵事宜。这样的“超擢”、“特简”，引起了举朝惊骇。^③

九月十七日，袁世凯谢恩召见时，光绪帝对他说：“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这等于明白告诉袁世凯，要依靠他的新陆军以与荣禄统率的旧军对抗。但袁世凯却是两面拉

^①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文忠（荣禄）时官兵部，约余同行。甫抵天津，首督王文韶公文忠传令各军排队迎迓，旌旗一色鲜明，颇有马鸣风萧气象。……文忠驰往小站。该军仅七千人，男子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齐倍壮，专练德国操。步伐五音，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文忠默识之，谓余曰：‘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余谓：‘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无精气，新军多用西法，生面独开’。文忠曰：‘足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逾参数昼夜，即以营门外德系卖菜的一条，已于严谨，其余各条，亦有轻重出入。余拟覆奏稿，请下密议。文忠谓：‘一经密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知乞恩始以宽议，仍严防认真督练，以励将来’。覆奏上，奉旨谕允”。

^②《光绪朝实录》，卷390第11—12页。

^③《光绪朝实录》，卷425第13页，卷426第1页及陈夔龙：《梦蕉亭杂记》。

找，在具折谢恩之前，先向西太后一边的军机大臣裕禄、刚毅、王文韶等人通风报信，取得保守派的谅解。

新党方面有人对袁世凯是怀疑的。但这时他们已陷绝境，认为“可救（皇）上者，只此一人”，于是带着极其危险的侥幸心理，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十八日夜間，谭嗣同访袁世凯于法华寺（袁的住处）。谭坦率地向袁提出，要他“杀荣禄，除旧党”，助行新政。袁世凯假装忠于维新派，当面对袁一口答应，还慷慨激昂地说：“杀荣禄如杀一狗耳”。谭嗣同满以为策划已经成熟。实际上，他是把“武装政变”的计划全部泄漏给袁世凯，并没有得到什么可靠的保证。^①

二十日，光绪帝再次召见袁世凯，袁却说了这样一段话：“新进诸人，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实际上，袁世凯经过“反复筹思”，认为维新派的实力有限，不易成功。当天傍晚，他就赶回天津，直奔总督衙门，把谭嗣同的策划向荣禄告密。荣禄挂专车到北京向西太后告发。次日，光绪帝被囚禁瀛台，仍由西太后“临朝听政”，谭嗣同等改良派首领六人被杀。袁世凯得到以西太后为代表的实权派的宠信，先升山东巡抚，又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

袁世凯借新建陆军为资本，插足维新运动，又以血腥的贩卖手段，换取个人的功名富贵，从此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4. 改编与扩编武卫右军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七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荣禄奏请，成立保卫首都的“武卫军”，由他自己统辖。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个军，编成如下：

武卫中军，抽调、招募旗丁（满族青年）万人，在南苑训练，驻防北京，由荣禄兼领。

武卫前军，由聂士成（直隶提督）的武毅军一万五千人改编，驻芦台，兼顾大沽、北塘，扼守北洋门户。

武卫后军，由董福祥（甘肃提督）的甘军一万二千人改编，驻蓟州，并担任通州一带防务。

武卫左军，由宋庆（四川提督）的毅军一万二千人改编，驻山海关内外，以防东路。

武卫右军，由袁世凯（候补侍郎）的新建陆军七千人（实数约一万人）改编，驻小站，扼西南要道。

新建陆军从此改名武卫右军。但由于其它各军都是旧军，所以此后一个时期，连清政府的官方文书有时仍称它为新建陆军。

^①王照在《方家四杂事记略》中评价这次会见说：“……所证者，皆虚语耳。夫以死生成败教唆语，是断非之末，已落于心矣。”

一八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荣禄奏：以新建陆军训练有效，候补侍郎袁世凯交部叙叙。

六月十六日，实授袁世凯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①

这时袁世凯仍在小站练兵。一八九九年七月，袁亲自主持编纂《训练操法详细图说》，参加纂校工作的有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阮忠枢、言敦源、吴懿孙、陆建章等。^②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初，清政府为镇压反帝爱国的义和团，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将武卫右军从天津小站开往山东。

一九〇〇年四月六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袁世凯上了一个《筹饷练兵酌拟办法》折，提出要再扩编一支军队。经荣禄奉旨审议，四月十九日奉上谕，“着照所请”，并将这支新军定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开始改编。^③

武卫右军先锋队共二十营，内有步兵十六营，骑兵两营，炮兵两营。

步兵是由登州府所属“东字中军”步兵十二营中抽调七营，加上济南、东昌、莱州各府所属“东字正军”步兵九营，共十六营；分左右两翼，前后左右四路，每路四营。

骑兵是将原“骠武”精健骑兵两营改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中路马队，分左右两营。

炮兵是新招募的两营，作为中路炮队。

总计步、马、炮二十营，集中在济南附近训练。^④

另外，还把山东的地方军队整编，将曹州、济宁所驻“飞马”军等四营，改编为左翼防军，分前后左右四营；兖州、泰安所驻“济”字军等四营，改编为右翼防军，也分前后左右四营；登州所属“东”字军等五营，改编为沿海防军，分前后左右中五营。

到一九〇〇年六月底，军队改编完成。袁世凯当时的兵力已超过原来新建陆军的两倍以上。

5. 镇压山东义和团

一九〇〇年，山东、河北一带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革命运动。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六日发表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十二月二十六日到达济南接任。

武卫右军全军开入山东。

袁世凯到任以后，立即颁发“严拿拳匪暂行章程”八条，大肆污蔑义和团是“左道邪教”，声言要“尽行剿绝”，四处张扬，制造舆论。同时，向北京发出了主剿的电奏。^⑤

①《光绪朝实录》卷444第11页。

②《训练操法详细图说》第二十二册附录，纂校、图绘、编写各员衔名。

③《光绪朝实录》卷461第12页。

④袁世凯：《筹海团奏议料要》内载《归并山东省各营酌拟整饬章程折》。

⑤《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三日广东道御史史朝聘奏参折。

一九〇〇年初，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在山东各地对义和团展开了追剿。根据《光绪朝东华录》的不完全记载，二月十日，骑兵营前队领官王开福、哨长阎凤鸣，在诸城县杨庄与东字前营、左营联合，在在平、博平、高唐一带冲散义和团的大股部队。三月，武卫右军步兵营管带雷震春、吴凤岭率军在东昌府一带屠杀团民，“所有坛场一律焚毁”。四月十三日，骑兵营右队哨官吕长顺与山东地方部队勇营配合，在禹城与义和团王立东、李传和部展开激战。六月十五日，骑兵营右队领官孟恩远驱散进击山东三间堂附近的盐山义和团部队。

袁世凯在山东大规模追剿义和团的行动，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骚动，先后有侍讲学士朱祖谋、福建道御史黄桂馨、广东道御史史熙麟、江南道御史高熙结、山东道御史许祐身、吏部给事中王培佑等人奏参。从这些奏参的条款里透露出来，袁世凯镇压义和团的方针是：“先行痛剿，然后奏报”，“……所部将弁营勇，恃其声望，复哗传于外，以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举有灭此朝食之势”。^①朱祖谋的奏参折中揭露出血腥屠杀的惨剧：

“……平原之役，杀拳会中人不过二三名，而无辜被戮者至百余人之多，

其中并有妇稚三十余口，冤惨之状，行路歎歎。”^②

袁世凯本意是要“先剿后抚”，但当时清政府害怕“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酿成大祸”，谕令袁世凯“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③所以，袁世凯执行的是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他注重造声势，雷厉风行，迫使山东义和团在一九〇〇年上半年陆续停止活动，有的解散，有的转入直隶省。山东各地“安谧”，习拳者“业已停止”。

袁世凯镇压义和团的行动，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一九〇一年五月《万国公报》载联军统帅瓦德西致袁的电报：“敝国人民在山东省境内犹能始终保护，毫无危险，实为感佩。以故敝国军队决不赴境剿办，毋庸系念。”

一九〇〇年六月，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占大沽，清廷命令袁世凯入京防卫。他取得荣禄的支持，只派少数兵力到直鲁边界，并派张怀芝带炮兵小队去北京，应付一下，实际按兵不动。他派人与驻青岛的各国领事相勾结，达成协议，保护教堂，保护洋人，借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八月，北京被侵占，荣禄的武卫军前、后、中三军分别覆没、溃散、资遣，取消了建制；武卫左军实力大大削弱；只有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完整地保存下来。

另一方面，袁世凯又对逃亡中的慈禧太后不断供应饷银、缎匹，表示忠顺。八月二十九日派候补知县曾硕儒、陈养源送银十万两，并将留山东的安徽解京饷银十万六千两、江苏解京饷银五万两一并送上，并具折奏报：“……臣仍当随时督同司道等赶紧巨款，源源接济，以期稍纾目前之急，籍可仰慰宸虞于万一”。到九月十七日，又派候补知县遵谦、即墨知县王可培，解送山东饷银十一万两和江西饷银十万两。^④李鸿章死

①《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十一日及五月十九日广东道御史史熙麟奏参折。

②同上，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侍讲学士朱祖谋奏折。

③同上，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福建道御史黄桂馨奏折。

④《养寿园奏议辑要》卷六第8页。

后，袁世凯被任命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当西太后和光绪帝从西安返回北京时，袁世凯派张勋带兵前往护驾，又派姜桂题去河南迎驾，以此换取清王朝对他的信赖、倚重。

这一时期，袁世凯着重在组织上网罗爪牙，培植亲信，拼凑班底。在政治上，施展反革命两面派阴谋手段，一面打着维新旗号，渗入维新派内部；一面暗中拉拢投靠顽固势力。依靠自己手中掌握的军事实力，看风使舵，翻云覆雨，进行政治投机，以便巩固政治地位，扩展军事实力。

叛卖维新派，破坏戊戌政变，使袁世凯在政治上初露锋芒；镇压义和团，保全武卫右军的实力，更取得清王朝进一步的信任和倚重。北洋军阀集团逐渐具备雏型。

（二）编练北洋常备军与统一全国军制

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适应清政府反动统治的需要，为了镇压人民，竭力扩充军队。从一九〇二年开始，在保定督练北洋常备军，到一九〇五年编成北洋陆军六个镇，由武卫右军时的一万多人扩充到七、八万人，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袁世凯从中操纵运用，使这些军队名义上是清朝政府的国家军队，实际上成为只听袁世凯一人指挥调动，完全效忠于袁世凯个人的反革命武装。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通过他所主持的清政府的练兵处，制定章程法令，从编制、训练、装备、薪饷、级衔等各方面，对清政府直辖的八旗、绿营等旧军和各省有新编的各种练军、防军逐步进行改革，达到统一号令，集中军权。又制定官制、勋章，以提高新军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巩固他对新军的控制。

1. 先编成北洋常备军左镇

一九〇一年十月，在帝国主义竭力推荐下，清政府任命袁世凯接替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①袁世凯把武卫右军带回保定。一九〇二年一月，袁世凯奏准从直隶善后赈捐项下拨款一百万两，募练新军。派王士珍、王英楷在正定、大名、广平、赵州等州县招募新兵六千名，在保定东关训练。同年五月，袁世凯奏准在保定创设“军政司”，管理督练新军的事务。

军政司督办由袁世凯兼任。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各处主管名总办；每处下而又分各股，各股主管名提调。

兵备处总办刘永庆。下分考功、执法、筹备、军需、医务五股。提调有言敦源、姜文熙等；总文案傅增湘，文案孟锡珏、管风和。

^①总督是清朝地方官中的最高一级，总辖一省或二、三省的军政民政。北洋大臣，是清朝政府任命的驻京大臣，除办理对外通商事务外，还兼管海防。

参谋处总办段祺瑞。下分谋略、调查、运输、测绘四股，提调有靳云鹏、鄒玉春、吴昭麟等，文案徐树铮。

教练处总办冯国璋，帮办郑汝成。下分教育、校兵、海防三股，提调有李纯、南元超等。

此外，还有营务处总办陈光远、吴钰孙；粮饷局总办陆嘉谷、袁乃宽；军械局总办徐华清、姜文熙等。

一九〇二年五月，袁世凯奏报：“现已挑选各属壮丁为常兵。拟先创练常备军一镇（相当于师），计步队十二营、炮队二营、马队四营、工程一营、辎重一营。”一九〇三年七月，编齐北洋常备军左镇。这是全国和北洋新军最早编成的一镇。

北洋常备军左镇分左右两翼，各设翼长一人，每翼步队六营，编制概要如下：

左翼翼长王士珍。步队第一营营长何宗莲；步队第二营营长鲍贵卿；步队第三营营长沈青山；步队第四营营长卢永祥；步队第五营营长王吉林；步队第六营营长张永成；右翼翼长王英楷。步队第七营营长王占元；步队第八营营长王宾；步队第九营营长何丰林；步队第十营营长杨善德；步队第十一营营长曹崑；步队第十二营营长朱泮藻。

另外，还有炮队二营，马队四营，工程兵辎重兵各一营。

由于这支新军是由北洋大臣袁世凯直接督练并统率的，所以名叫“北洋常备军”。

2. 练兵处集中军权

一九〇三年，袁世凯奏请在北京设立练兵处。为了避免皇族疑忌，袁世凯力请庸懦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自己居会办大臣，而掌握练兵实权，铁良为帮办大臣。袁世凯准备统一全国新军的编制，计划在全国扩编新军三十六镇。一九〇三年十月十六日有一道上谕：

“前因各省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迭经降旨饬下各督抚认真讲求训练，以期划一。乃历时既久，尚少成效。必须于京师特设总汇之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齐整，而重戎政。着派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近在北洋，着派充会办练兵大臣，并着铁良襄同办理。该五大臣等受恩深重，务当担任劳怨，认真筹办，以副朝廷力图自强之至意……”。

一九〇四年，袁世凯等拟具了《练兵处分设司科管理章程》，奏折略称：

“……伏维中国幅员广大，各省兵制庞杂纷歧，其势散漫，不能精整，以至流为积弱。今朝廷鉴于此弊，特为居中策驭之法，以力求划一整齐之规。惟是事体重大，头绪繁多。必须分设司科，各专责成，方能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各国治兵大率如此。

臣等现拟练兵处专设提调一员，掌管庶务，综理文牍。分设三司：一曰军政司，一曰军令司，一曰军学司，各设正使一员，副使一员。

又于军政司分设六科：一、考功科，掌管升降调补，核奖行赏等事；一、搜计科，掌管官兵数目，典制，征募等事；一、粮餉科，掌管筹备粮需，会计

出入等事；一、医务科，掌管整洁卫生，选察医员等事；一、法律科，掌管拟定军律，定讞察狱等事；一、器械科，掌管纠察，制造，储备军械等事。

军令司分设四科：一、运筹科，掌管筹防，参谋，探敌，戒严等事；一、向导科，掌管相度道路，筹计征运等事；一、测绘科，掌管测绘地势，修校舆图等事；一、储材科，掌管作养高才，纂译秘略等事。

军学司分设四科：一、编译科，掌管编辑操典，翻译图书等事；一、训练科，掌管校政操法，评定殿最等事；一、教育科，掌管筹办学堂，核定教法等事。

附设水师科，掌管水师名册，筹划整顿等事。

通计以上共设一提调，三司，十四科。该提调暨三司正副各使请旨简派；其各科分设监督，由臣等慎选奏委；其以下各股管理委员暨各司科所需员弁，由臣等察看事物之繁简，随时酌量选派。并督飭司将各项详细章程分别拟定，以期各有专责，讲求易精……”^①

这个章程经清廷批准。袁世凯趁此机会进一步扩充他的势力。他把亲信徐世昌调任练兵处的总提调，冯国璋为军学司的正使，段祺瑞为军令司正使，王士珍为军政司正使。把练兵处实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为集中军权，袁世凯等又拟定一个《练兵处办事简要章程》：

“一、令出惟行兵家第一要义，稍有藐玩，必至愆事。……嗣后提、镇以下各武职，遇有玩抗军令，训练不力，或狃于积习，纪律不严者，由臣处查明，先行撤差，一面奏参惩办。其有缺额蚀饷者，尤当从重治罪。至关于练兵各项处分，均请由臣处核议。

一、……倘地方官督抚以下各文员遇事掣肘，迁延贻误，或别存意见，有意见阻挠，均是败坏戎政，即由臣处奏参。……

一、新练各军办理兵事人员……一律改为实缺，……其守备以上各缺，由臣处考查才具资格，分别奏请升调补署；千总以下，由臣处酌量叙补，随时注册。……

一、原拨新练各军饷项暨续筹专饷，均解由臣处饷局收放。……其续筹各专款，统由臣处督催经理。

一、各省原设制造军械各局厂，……应统由臣处督飭妥办……。

一、各省新练各军，必须时常派员前往考查督练，以资核实而期划一……。

一、……遇有添派将弁之处，必须在曾经学习操练，通晓兵法人员内选充，其未经学习毫无历练者一概不准充补，以杜幸进而免滥竽。

一、臣处新设各司科，均在曾历营务人员中选补，各军背遇有将领空缺，亦可在司科中酌选接替，以期内外接洽，不至扞格。”^②

^①《东方杂志》第一年第十二期第151—152页。

^②《东方杂志》第一年第四期第201—201页。

这样。袁世凯就把全国的军权集中到练兵处，而练兵处的实权又操在他和他的亲信手中。

3. 统一全国军制

练兵处成立后，一面直接编练新军，一面逐步改革八旗、绿营以及各省的旧军。从一九〇四到一九〇五年，袁世凯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拟定了一套《陆军营制饷章》，包括立军、分军、督练、设官、募兵、军令、训练、校阅、奖惩、恤赏、薪饷、营舍、军械等规定。^①

关于陆军营制，规定各省设督练处，负责编练新军。新军编制以军为单位，每军下辖两镇至三、四镇，每镇辖步兵两协，马队、炮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军乐一队。每协步兵两标，每标三营，每营分前、后、左、右四队，每队三排，每排三棚，每棚目兵十四名。

镇，大体相当于后来的师；协相当于旅；标相当于团。军的首领称为总统官，镇为统制，协为统领，标为统带，营为管带，队为队官，排为排长。（北洋军只在会操时临时编组军的建制，平时仅有镇的番号。）

统一官制，统一饷章，是两项重要的措施，袁世凯竭力提高军官的级衔，规定优厚的薪饷，用以维系这支反革命武装。一九〇五年，由练兵处和兵部会奏拟定《陆军人员任职等级及补官体制章》，^②规定陆军官佐为三等九级：

高等第一级：正都统、提督，为从一品，任职为军的总统；

第二级：副都统、总兵，为正二品，任职为镇的统制；

第三级：协都统、副将，为从三品，任职为协的统领、总参谋官；

中等第一级：正参领、参将，为正三品，任职为统带官、卫队参领、正参谋官、总军需官等；

第二级：副参领、游击，为从三品，任职为一等参谋官、中军官等；

第三级：协参领、都司，为正四品，任职为管带、教练员、三等参谋官、参军官等；

次等第一级：正军校、守备，为正五品，任职为督队官、队官、三等参谋官、执事官等；

第二级：副军校、千总，为正六品，任职为排长、掌旗官等；

第三级：协军校、把总，为正七品，任职为司务长、司号长等。

饷章规定：总统官薪水银六百两，公费一千两；统制官薪水银四百两，公费银六百两；统领官二百两，公费三百两；统带官二百两，公费二百两；管带官一百两，公费一百四十两；督队官五十两；排长二十五两；司务长二十两；弁目十两五钱；正目五两一

^① 《东方杂志》第二年第二期第76页。

^② 《东方杂志》第三年第一期第12—13页。

钱；副目四两八钱；正兵四两五钱；副兵四两二钱；备补兵三两三钱。

练兵处的再一项重要措施是统一武器规格。经过几次酝酿，最后于一九〇六年由清廷核准练兵处提出的枪炮程式为：

快枪口径六密里八，枪筒长一百十五倍口径，初出枪口速率六百五十密达。

陆路炮口径七生的五，身长二十八倍口径，炮身推闩三百六十启罗，炮架高一密达，两轮相距一米达三；子弹用开花、子母、葡萄三种，子弹初速率须五百密达以上，击远须五千密达以上，仰度十六度，俯度六度，快放速率每分钟十五出。

过山炮口径七生的五，身长十五倍口径，炮架高六十四生的，两轮相距八十生的，炮架最重之件不得超过一百一十启罗，子弹用开花、子母、葡萄三种，子弹初速率须三百密达以上，击远须三千五百密达以上，炮仰度二十度，俯度十度，快放速率每分钟十五出以上。^①

练兵处这一程式“分别札飭各局厂遵照此新定式样，购机遵制。其旧造各式，悉令停止”。

再一项重要措施，是一九〇五年奏准的《变通武备章程》，^②其中规定：

(1) 王公大臣子弟肄习兵学，开办贵胄学堂。并为王公世爵专设一所贵胄讲习所，随时到堂研究兵学。

(2) 绿营引见人员一律改习枪炮，京补各旗及东三省各旗都照办。

(3) 皇帝出入，由陆军各执新式枪械，前后护卫。原来扈从各官去掉弓矢，改为佩刀。

(4) 守卫宫禁的亲军营、前锋营、护军营分别考验淘汰。另从已练成各镇挑选官兵组成扈卫军代替。

(5) 侍卫选择各镇军官及陆军学堂毕业的世袭世职人员担任。

(6) 今后挑选旗兵一律试枪炮，并试以文字。

(7) 满汉世爵世职奏准承袭后，均应入陆军学堂肄习兵学。凡未入学堂者，虽已袭职，只以减半给俸，不准补官。

这一措施，使清朝军制改革深入到宫禁宿卫制度，并涉及王公大臣子弟仕途出路等方面。

此外，还在北京、天津、湖北、陕西、江苏等地设立武备学堂；通令各省兵弁剪发易服；通令各省改变营制，改习日本操法；通令各省分绘一统舆图，等等。

4. 北洋常备军的扩编和陆军六镇编成

在练兵处统一全国练兵事务的时候，原在保定督练北洋常备军的直隶军政司改称督练公所，继续保留下来。袁世凯仍兼督办，以王士珍、王英楷为总参议，言敦源（后任

^① 《东方杂志》第三年第十二期第191页。

^② 《东方杂志》第三年第二期第45—50页。

田文烈)为兵备处总办,段芝贵(后任聂宪藩)为参谋处总办,何宗莲(后任张绍曾)为教练处总办,唐在礼、袁克定、金邦平为参议,继续编练北洋常备军。

一九〇三年初,由保阳练军马队及亲军马队裁并,编成马队一标四营。一九〇四年二月,又将元字淮军、北洋亲军马步各营归并改编成协。同时在直隶各地和山东、河南、安徽招募新兵编成步队一协,及炮、工、辎各营队,三月编成,称北洋右镇。^①

一九〇四年七月,奏将北洋常备军左镇改为北洋常备军第一镇,统制为王英楷;右镇改为第二镇,统制为吴长纯。同时,又从河南、安徽、山东等省招募新兵,编成北洋常备军第三镇,统制为段祺瑞。驻保定。^②

一九〇五年二月,练兵处奏准,将驻京的武卫右军合并自强军及第三镇各标第二营编成北洋常备军第四镇。仍驻原地。^③

一九〇五年五月,以山东的武卫右军先锋队十二营,由第四镇抽调步、炮六营,又从山东各地招募新兵,编成北洋常备军第五镇。^④

北洋常备军五个镇的番号存在时间不长,一般容易与后来的北洋陆军六镇番号混淆,实际是不同的。

除北洋常备军外,还有一九〇二年六月袁世凯奉命训练的、由八旗兵丁三千人编成、由铁良统率的京旗常备军。一九〇四年,京旗常备军添营成协;一九〇五年五月,添协成镇。

就在京旗常备军成镇的同时,练兵处奏定全国新军一律改称陆军,并统一番号,即作为由中央政府直接统辖的武装部队,不再是地方性的部队。^⑤

番号改变情况如下:

陆军第一镇——由原京旗常备军改名。统制为凤山,继任何宗莲。铁良原在京旗常备军任练兵翼长,改名第一镇后,铁良未当统制。第一协统领曹锟,继任的是李元;第二协统领何宗莲,继任的是朱泮藻。

陆军第二镇——由原北洋常备军第一镇改名。统制是王英楷,继任的有马龙标、张怀芝、王占元等。第三协统领王占元,第四协统领鲍贵卿。

陆军第三镇——由原北洋常备军第三镇改名。统制是段祺瑞,继任的为段芝贵、曹锟。第五协统领雷震春,继任的有徐占凤、卢永祥;第六协统领张永成,继任的有徐万鑫、陈文运等。另有马标标统(骑兵团长)张国泰。

陆军第四镇——由原北洋常备军第二镇(再早是右镇)改名。统制是吴凤岭,继任的有陈光远、王遇甲等;第七协统领杨善德,继任王遇甲;第八协统领陈光远。马标标统孟恩远。

①《第四镇镇表》,《陆军部档》。

②《养寿园奏议》卷27未刊本。

③《清朝续文獻考》卷220,兵19,页9668。

④《军机处未批奏折档》,第一历史档案馆。

⑤《军机处录副档》,第一历史档案馆。

陆军第五镇——由原北洋常备军第五镇改名。统制吴长纯，继任有张怀芝、张永成。第九协统领洪自成，继任马良；第十协统领贾宾卿。

陆军第六镇——由原北洋常备军第四镇改名。统制是王士珍，继任的有段祺瑞、赵国贤、吴禄贞、李纯等。第十一协统领陆建章，继任李纯；第十二协统领周符麟，继任吴鸿昌。

过去近代史著作中习惯用“北洋六镇”的说法，对于这六镇的起源和变迁容易产生混淆。因为，在北洋常备军的建制中，只有过五个镇的番号，而且第四、第五镇的番号存在时间很短。有了六个镇的番号时，已经不是北洋常备军，而是全国统一的陆军。尽管六镇的主要干部全是袁世凯一手培养提拔的忠实爪牙，尽管这些军队实际上仍在袁世凯的操纵控制之下，但从清政府正式文书中，已改称陆军第×镇了。

5. 北洋会操

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的计划，直到清政府被推翻也没有实现，唯独由袁世凯督练的北洋陆军六个镇陆续编成。这是因为清政府一向把北洋陆军作为中央直辖的主力部队，保卫京师，驻防直隶，给予特殊的重视；同时，袁世凯借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兼练兵大臣的职务便利，竭力扩充实力，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

六镇编成后，一九〇五年九月，在直隶（河北省）河间举行一次会操，清廷派袁世凯、铁良校阅。^①这次会操，调动驻马厂的第四镇全镇，驻迁安第二镇内抽编的第四混成协，驻山东第五镇内抽编的第九混成协，共一个镇两个混成协组成南军，派统制王英楷暂充总统官。驻保定的第三镇全镇，京旗第一镇内抽编的第一混成协，驻南苑第六镇内抽编的第十一混成协，也是一个镇两个协合编为北军，派统制段祺瑞暂充总统官。并在河间预先设立阅兵处，派冯国璋为总参议。

九月二十三日，南军齐集交河，北军齐集高阳，南攻北御，以河间为会战之区。二十六日两军接战，二十七日演习结束，二十八日举行阅兵式，并邀中外随观人员在河间宴会。总计参加演习的官兵四万多人，马五千匹，车一千五百辆，战线长二十余里，各省各处观操者二百数十人。据袁世凯等事后奏报：“……此次会操非第以齐步伐、演技击、肆威容、壮观瞻而已，盖欲以饬戒备、娴战术、增长将士之识力，发扬军人之精神，熟悉于进退攻守之方，神明于操纵变化之用……”。得意洋洋地表示：“此一役也，仿列邦之成规，创中国所未有”，“……一旦调集会演，已駸駸（音qīn，快）乎有整齐划一之观。将来推之各省，行之通国，但使教育普及，又何难万众一致，积健为雄，以邈（音chènɡ，宣扬）皇威，而张国力”。并自吹自擂地说：“风声所树，耸动环球”。

到一九〇六年九月，又举行一次彰德会操。由户部尚书铁良、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校阅。^②其南北两军的编成如下：

^① 《东方杂志》第三年第一期第5页。

^② 《东方杂志》第三年第十二期第183页。

北军一军，由段祺瑞暂充总统官。从驻山东第五镇内抽拨步兵一协，马、炮队各一标，工程队一营，从驻南苑第六镇内抽拨步兵一协，驻直隶第四镇内抽拨炮队一标，合编为混成第五镇；又在京旗第一镇内抽拨步兵一协，马、炮队各一标，工程队一营，编作混成第一协。合计一个混成镇，一个混成协。

南军一军，由张彪暂充总统官。调驻湖北的第八镇全镇和驻河南的第二十九混成协合编。计一个镇，一个混成协。

九月初在河南汤阴的十里铺、彰德的二十里铺、南马官屯、钟官屯一带，实战演习三天，初八举行阅兵式。并举行宴会。袁世凯对这次会操的评价是：“此次复举数省已编之军队萃集一处，而运用之，使皆服从于中央统一号令之下，尤为创从前所未有，系四方之瞻听”，“以视去年河间一役，规模尚远，殆为过之。”

这两次会操表明：不仅每年开支饷银九百余万两的北洋六镇早已在袁世凯直接掌握之中，现在又使“数省已编之军”都服从于袁世凯的“统一号令之下”。袁世凯的权势达到了新的高峰，北洋军在国内外政局中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筹码。

两次会操（又称北洋秋操）正是袁世凯十年来拼命抓枪杆子，培植个人势力取得初步成果的一次大展览；也是在六镇编成不久，北洋军阀集团羽翼丰满，袁世凯情不自禁地组织两次炫耀实力的大示威。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至此已经形成了。

（三）袁世凯窃夺政权 北洋军阀统治全国

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清廷一片混乱。国内外反动派看到袁世凯具有潜在的实力，极力制造“非袁不能收拾大局”的空气，敦促清廷起用袁世凯绞杀革命。于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以袁世凯为头子，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北洋军阀集团乘机窃取了北京政权。

袁世凯首先抓过军权，随即采取又打又拉、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策略，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挤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职位，屠杀革命党人，扑灭“二次革命”。北洋军阀势力侵入长江流域，统治了全国。

1. 北洋军阀占据北京政府

袁世凯编练新军，实力越来越大，引起了清朝皇族的猜疑和嫉妒。双方展开了争夺兵权的斗争。袁世凯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每年以北洋陆军“截旷银”（超额兵饷）上贡西太后，贿赂奕劻和太监李莲英。一九〇六年冬，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将北洋陆军的一、三、五、六镇收归陆军部尚书铁良直接统辖，削弱了袁世凯的兵权。一九〇七年，清政府又进一步任命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迫令他交出全部兵权。一九〇八年，光绪与西太后相继死去，溥仪继承皇位，载沣为摄政王。载沣本来想杀袁世

凯，但惧于袁世凯的潜在权势，未敢下手。于次年一月令袁世凯以“足疾”为名，回河南老家“养病”，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但是，北洋军队早已养成只听袁世凯一人调遣的习惯，袁世凯虽然下台，仍在暗中操纵北洋军队。

一九一一年秋，武昌起义，清政府把北洋陆军编为三个军，由陆军大臣荫昌统辖第一、二军，由冯国璋、段祺瑞分任军统，开赴湖北镇压革命。第三军守卫北京。冯国璋的军队开往湖北，他本人却先去河南向袁世凯请示。

清政府在指挥不灵的情况下，又受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官僚的催促，被迫起用袁世凯。几经周折，到十一月一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取得了北京政府的全部实权。

袁世凯一上台，就派徐世昌接替裁涛为军政府大臣（相当于总参谋长），由冯国璋接任禁卫军总统官，王士珍为陆军部大臣，赵秉钧为民政部大臣。不久，袁世凯又把摄政王载洋赶下台，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完全落入袁的手中。

经过南北议和，清帝宣统退位，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支持下，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取代清朝政府，建立了大地主、军阀、官僚的专政。

这时，北洋军阀和依附袁世凯的旧官僚，占据了北京政府的重要职位：

陆军部：总长段祺瑞，次长靳云鹏、徐树铮；

海军部：总长刘冠雄，次长汤寿潜；

参谋部：次长代理部务陈宦；

北京步兵统领，江朝宗；

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

北京军警执法处兼警卫军统领，陆建章；

拱卫军统领，段芝贵；

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

总统府指挥使，徐邦杰；

北京军警督察长，马龙标；

北京宪兵司令，李飞鹏。

同时，北洋军阀还占据了黄河流域各省的重要地盘，如冯国璋为直隶都督，张锡奎为东三省宣抚使，何宗莲为察哈尔都统，张绍曾为长江宣抚使，周自齐为山东都督，阎锡山为山西都督，张镇芳为河南都督等。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颁布“训勉军人令”，提出“服从统一命令”。接着，他大叫军队太多，人民负担不起，想借以削弱南方的军队。袁世凯不断向外国借款购买大量军械，把北洋陆军加以扩充。一九一二年，原有的陆军六镇改称陆军第一师至第六师，第二十镇改称第二十师。师长为：

陆军第一师师长 何宗莲（后任蔡成勋）；

陆军第二师师长 王占元；

陆军第三师师长 曹 錕；

陆军第四师师长 杨善德；
陆军第五师师长 张怀芝（后任靳云鹏）；
陆军第六师师长 李 纯（后任马继曾）；
陆军第二十师师长 范国璋。

将张勋所率自南京溃退到山东的十几营江防军残部扩编到四十营，命段芝贵在豫北招募补军五十营，名为光复军，编成十路，每路五营。后来又改称拱卫军和警卫军，分由段芝贵、陆建章统领。又委任倪嗣冲为毅军翼长，在河南招募新军二十营；并命姜桂题把所率武卫左军恢复毅军旧名，扩编二十营；冯国璋所率禁卫军也给予大量扩编，成立直隶第一混成旅。

2. 北洋军阀势力扩展到南方

一九一三年七月，南方的国民党人刚刚发出讨袁的通电，袁世凯的北洋军已向南方各省大举进攻。冯国璋、张勋、雷震春三路攻南京；郑汝成攻上海；倪嗣冲攻安徽；段芝贵、李纯攻江西；龙济光攻广州；刘冠雄、汤芑铭率海军舰队镇压闽、湘两省；依附袁世凯的地方封建军阀如广西陆荣廷、贵州唐继尧、四川胡景翼分别派兵镇压了当地宣布独立的革命军。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南方八省都被北洋军阀打败。从此北洋军阀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和沿海各省。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十月十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集团统治了全国。

北洋军阀占据了南方各省的军政要职。计：刘冠雄为海军总长兼南洋巡阅使；张勋为江北镇抚使，后为江苏都督，又迁长江巡阅使；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后接替张勋为江苏都督；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雷震春为河南护军使，迁长江查办使；李纯为第六师师长，江西护军使，江西都督；倪嗣冲为安徽都督兼民政长；龙济光为广东镇抚使，广东都督；汤芑铭为海军次长，湖南都督；朱瑞为浙江都督；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王宾为淞江镇守使；蒋雁行为江苏江北护军使；王廷楨为江宁镇守使；吴金彪为九江镇守使；李廷玉为赣南镇守使；吴鸿昌为赣西镇守使；鲍贵卿为安徽大芜镇守使；王占元为第二师师长，湖北护军使；杜锡钧为汉口镇守使；李厚基为福建镇守使，护军使；……

3. 北洋陆军的大举扩编

袁世凯当总统以后，大举扩编北洋军，到一九一五年底，已达到中央陆军十六个师和十四个混成旅。除原有第一师至第六师及第二十师外，其余番号及编成情况如下：

一九一三年扩编的有：

第七师——由警卫军左路营扩编为警卫军第一师，又改称陆军第七师；师长陆建章，后任张敬尧。

第八师——拱卫军前路营扩编；师长李长泰。

第二十七师、二十八师——由奉天巡防营扩编；师长张作霖、冯德麟。

第二混成旅——由第一师第一旅扩编；旅长褚恩荣，后任刘跃龙。

第三混成旅——由备补军中路营扩编；旅长黄振魁。

第四混成旅——由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扩编；旅长伍祥楨。

第五混成旅——由直隶第一混成旅改编；旅长刘询。

第六混成旅——由第二师补充旅扩编；旅长王都庆。

第七混成旅——由各补营第一路扩编；旅长唐天喜。

一九一四年继续扩编的有：

第九师——南方军黎天才部与毅军赵荣华部合编；师长黎天才。

第十师——第三师第五旅扩编；师长卢永祥。

第十六师——禁卫军一部改编；师长王廷楨。

第一混成旅——第二师、第五师各抽一部分建成；旅长李炳文。

第八混成旅——各补营第二路扩编；旅长徐占凤。

第九混成旅——第六师抽出一部扩编；旅长丁效兰。

第十混成旅——第五师第十旅扩编；旅长施从滨。

第十五混成旅——第七师第十三旅扩编；旅长贾德耀，后任管金聚。

第十六混成旅——第七师第十四旅扩编；旅长冯玉祥。

一九一四年秋，袁世凯为继续扩建军队，培养下级军官，成立军事模范团，自兼团长，他的儿子袁克定为副团长。准备再建十个师。一九一五年，模范团与拱卫军合编，扩建成第十一师和第十二师，师长张永成、陈光远。以第十师第十九旅扩编为第十四混成旅，旅长为臧致平。

其后，还把张勋所部江防营再加扩编，达五十七营，称为“定武军”，张勋为军统；冯国璋所部禁卫军改编为“宣武军”，冯为军统；龙济光所部改称“振武军”，又称“济军”，龙为军统；倪嗣冲所部改称“安武军”，倪为军统；毅军旧部扩编，委姜桂题爲军统；河南区侧所部编为“宏威军”，赵为司令。刘镇华为河南镇嵩军司令。

4. 晋封将军与帝制封爵

袁世凯窃夺大总统职位后，集中军权，实行独裁，一九一四年，在总统府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陆军、海军、参谋各部的总长都是统率办事处的办事员，由袁世凯自己直接指挥军队。又设立将军府，取消各省都督的名称，授以将军的头衔，有的继续督理各省军务，有的则夺去实权。

晋封将军职衔如下：

建威上将军段祺瑞，陆军总长，管理将军府事务；

宣武上将军冯国璋，督理江苏军务；

定武上将军张勋，长江巡阅使，督理安徽军务；

振武上将军龙济光，督理广东军务；

彰武上将军段芝贵，督理湖北军务；

昭武上将军姜桂题，督理热河军务；
镇安上将军张锡奎，督理奉天军务兼节制黑龙江、吉林军务；
威武将军张作霖，督理奉天军务；
镇安左将军孟恩远，督理吉林军务；
镇安右将军朱庆澜，督管黑龙江军务；
安武将军倪嗣冲，督理安徽军务；
昌武将军李纯，督理江西军务；
兴武将军朱瑞，督理浙江军务；
靖武将军汤芑铭，督理湖南军务；
成武将军胡景翼，督理四川军务；
毅威将军陈宦，督理四川军务，兼四川巡按使；
开武将军唐继尧，督理云南军务；
泰武将军靳云鹏，督理山东军务；后调果威将军；
济武将军张怀芝，督理山东军务（接靳任）；
同武将军阎锡山，督理山西军务；
宏威将军赵倜，帮办河南军务，后改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
壮威将军王占元，帮办湖北军务，后改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
宁武将军陆荣廷，督理广西军务；
威武将军陆建章，督理陕西军务；
昭威将军蔡锷，统率办事处大办事员；
扬威将军张凤翔，参政院参政；
宣威将军蒋尊簋；
彰威将军郑汝成，上海镇守使；
克威将军杨善德，淞沪护军使；
虎威将军曹锟，长江上游总司令；
震威将军雷震春，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
迪威将军江朝宗，北京步兵统领；
靖威将军蒋雁行，陆军训练总监。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对于北洋系的重要人物，都封了爵位：

一等公：张勋、冯国璋、龙济光、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赵秉钧（死后追封）；

二等公：刘冠雄，共八名；龙济光后加郡王衔。

一等侯：汤芑铭、李纯、朱瑞、赵倜、阎锡山、王占元、陈宦、陆荣廷、唐继尧共九名；

一等伯：雷震春、张锡奎、靳云鹏、陆建章、孟恩远、曹锟、杨善德、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杨增新、屈映光、齐耀琳、徐宝山（追封），共十四名；

一等子：朱庆澜、陈光远、米振标、张文生、马继曾、张敬尧、李厚基、张广建、刘昱世；二等子：倪毓芬、张作霖，共十一名；

一等男：林葆懌、饶怀文、吴金彪、王金镜、鲍贵卿、宝德全、马联甲、良安、马何宗莲、白宝山、潘奎徽、张怀芝、龙觀光、卢永祥、王廷桢、施从滨、黎天才、杜锡珣、杨飞霞、江朝宗、徐邦杰、李进才、马龙标、吴炳湘、许世英、戚扬、吕调元、蔡儒楷、金永、沈金鉴、段书云、王揖唐、龙建章、任可澄；二等男：吴俊陞、王怀庆、吴庆桐、冯德麟、张载阳、石星川、李兆珍；三等男：吴鸿昌、马福祥、李长泰、张树元、许兰洲、朱熙、马龙潭、陈树藩、隆世储、杨以德，共五十一名。

袁世凯依靠北洋军为起家的资本，上台之后更大肆扩张军队，他的亲信爪牙势力逐渐膨胀，各占地盘，实行封建割据。袁世凯采取种种防范、笼络、制约的办法，制止不住军阀之间的倾轧争存。袁世凯称帝八十三天，全国人民奋起倒袁，北洋军阀内部分崩离析更加表面化。袁世凯被迫下台，最后结束了罪恶的一生。而他挖空心思，惨淡经营二十年的北洋军阀集团立即四分五裂，争夺权力的斗争持续十余年，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

北洋军阀的黑暗反动统治造成中国近代史的一次大倒退。北洋军阀集团之所以能够起到这样顽固的反动作用，就因为他们都拼命抓枪杆子，都“爱兵如命”，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北洋军是他们的反动工具，是他们的政治资本。依靠这支反动武装，这一帮昏聩、腐败、暴残的反动军阀才轻易取得政权，祸国殃民。

北洋军阀集团的产生与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的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必然的产物。北洋军阀集团是在封建的亲属关系、同乡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把兄弟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等基础上结合起来的。在政治上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利害相关。其后，这样反动的封建关系进一步发展，又促使北洋军阀集团分裂为各个派系。

北洋军与清朝旧军相比，是一支新式军队。当时，新的编制，新的装备，新的训练，是中国新式陆军的开端，与旧军面貌完全不同。但是这支军队仍然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反动工具。从新建陆军开始建立到北伐以后北洋军消亡，三十余年间，这支军队枪口始终对着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屠杀了无数的人民，从来没有同帝国主义侵略者打过一仗。而且，每个军阀当他争权夺势的时候，无不竞相投靠帝国主义，甘当卖国贼。在反动派掌握下，军队的装备训练越好，危害人民的反动作用越大，但终于被历史的巨轮所粉碎。

《北洋军阀史稿》讨论会纪要

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工作，一直是史学研究领域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最近以来，这一问题开始为人重视，但目前研究成果尚少。天津是当年北洋军阀头目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这就给我们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条件。近两年来，天津关于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工作已初见成果。除已有关于北洋军阀史的论文陆续发表外，南开大学来新夏、郭剑林、焦静宜三同志编著的《北洋军阀史稿》一书已经脱稿。受他们的委托，民盟天津市委员会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邀集有关人员召开了座谈会，征求对《北洋军阀史稿》（油印稿）的修改意见，并对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座谈会在民盟市委员会举行，参加座谈会的有天津市社科院、天津市政协文史办、天津文史馆、天津师院历史系、山东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的同志，《北洋军阀史稿》的责任编辑、湖北人民出版社的陈箕裘同志也远道来津出席了座谈会。座谈会由天津社科院杨思慎同志主持。在他的倡议下，座谈会以讨论的方式进行，使大家更能畅所欲言，气氛十分活跃。

来新夏同志首先发言，他代表《北洋军阀史稿》的编著者对组织这次会议的市民盟表示感谢，并希望得到与会各方面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他说：“这部油印本还是初稿，仍需做进一步的订正修改。目前对北洋军阀史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我们真诚地希望这部书起到铺路石子的作用，使后来人在我们这个粗糙作品的基础上更有进展。”

徐景星同志接着发言，他说：“从我接触到的材料来看，我们国内对北洋军阀史的研究较差，国外有人写过关于北洋史的书，但多不是完整的，我很希望这部书真正具有我们自己的水平，在这方面做出一点成绩来。”他针对书中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对张勋复辟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他认为派系的分合、冷战热战，是这一阶段的共性，而复辟是这一时期的特性。四次徐州会议酝酿了复辟，但最后决定采取复辟行动的是第四次徐州会议。对于张勋复辟，各帝国主义都有反映，而真正支持张勋复辟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对张勋复辟的态度经过了多次反复，直到复辟已成事实才决定支持张勋。但仅几天功夫张勋倒台了，日本帝国主义立即转而支持段祺瑞。这说明帝国主义对各军阀的态度完全按其需要出发，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孙宝铭、吴思鸥同志对《史稿》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孙宝铭同志说，作为北洋军阀，其特点就是以军称阀，扩军称霸，因此北洋军阀史要着重在北洋军阀本身。书中谈到的北洋军阀的沿革问题，我认为北洋军阀与湘淮军的根本不同点，就是从创练新军开始的，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进行了军制改革，这是中国军事史上破天荒的大事，因此应当再深入探索一下陆军军制问题，对于军制改革这一点应适当肯定。另外，北伐后期产生的新军阀与北洋军阀的特点是不同的，这一点值得注意和研究。吴思鸥同志也谈到，北洋军阀史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在写作中应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

谢天培同志发言说,《史稿》中对北洋军阀史的分期是恰当的,他认为“北洋军阀”的特点有三:一是拥有雇佣军队,二是进行封建割据,三是投靠帝国主义,总的来说是祸国殃民。北洋军阀之间进行过几次大的战争,应当把这几次战争的阵容反映出来。但截至现在,北洋时期到底有多少军队,一直找不到一个完整的東西。如北伐时期的安国军,目前还不知道它整个编制到底多大,我们只能在当时的报纸上看到一些零碎的反映。这些如能整理出来,将是对史学工作的一个有益的贡献。

山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任恒俊同志说,中国的北洋军阀集团是近代世界各国,特别是在亚洲出现的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很有深入探讨的价值。要开辟一条研究的道路,探讨其产生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原因,这样才使对北洋军阀的研究更具有深度和广度。他说:“我认为北洋军阀的产生不仅仅是个军事问题,当然其产生的首要和基本的原因是由军事开始,但还要看到中国专制中央政权政体的衰落和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这两种原因。”他还谈到北洋六镇的编制问题,历来很混乱,特别是“武卫右军先锋队”的人数,近来出版的著作中也众说不一。他经翻查资料 and 比较鉴别后认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人数应为“一三七〇〇人。

乔维熊同志说,《史稿》比较注意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使这部书的完成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研究北洋军阀史的兴衰将会起很好的作用。天津过去是北洋军阀的窝子,过去,北洋统治的前台在北京,后台在天津,所以天津是研究北洋军阀的好地方,而在天津出一本北洋军阀史也是有力量的,应当把这本书尽快地写出来。应当说,我们中国人研究北洋军阀应当比外国入更有成绩。另外,他对《史稿》的序论部分做了分析,对北洋军阀史的分期问题、阶级基础问题等都比较详细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南开大学历史系李喜所同志说,序论中提出“北洋军阀史”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这两个概念,很深刻,很正确。这一直是一个关于近代史专史著作中一个解决得不太好的问题,还可以再深入地展开论述,说明这两者究竟区别在哪些点上。他说,“北洋军阀这一概念现在已不仅是军事集团的概念了,它还包括了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而这本书,应侧重写政治史。”而且“史稿中仅讲北洋集团内部的斗争还不够,还需要再勾画一下北洋时期的社会状态,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的社会风貌。”另外,他认为过去很少有介绍政党的书籍,《史稿》中对民初政党已设节介绍,似应再增加更多的内容。

杨思慎同志最后作了综合性的发言,他说:“为什么在中国近代史上会出现军阀割据的特殊现象?这不是偶然的。中央统治力量减弱,自然就会出现割据,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历次割据局面的历史背景看都是如此,而北洋军阀的出现也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所不同的是近代又加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对各军阀的支持,才造成了中国出现了这一特殊现象。”他还说,近代军阀与以前的军阀不同,与以后出现的新军阀也不同,他期望要在“阀”字上再多作一些文章。

年逾古稀的梁叔达老先生对北洋军阀的兵力做了具体的介绍。

座谈会上,大家除了对《北洋军阀史稿》(油印稿)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外,还对其中涉及的有关北洋军阀形成的时间、北洋军阀的特点、北洋军阀本身的阶级属性及其

社会基础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研究。这是很长时间以来天津关于北洋军阀史研究工作的第一次聚会。虽然规模较小，人员也未能邀集齐全，但由于民盟天津委员会对这项工作的支持和协助，使大家有机会相聚畅谈。座谈会上，各方面提出的中肯意见，使《北洋军阀史稿》的编著者深受教益，同时，这一良好开端，也使大家对今后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工作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附：《北洋军阀史略》日译本绪言（摘要）

原著《北洋军阀史略》，一九五七年五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洋军阀史略》自出版以来，已历时十年多了。在今天看来，尚有不尽完善之处，需做更深一步的研究。然而，本书依据具体的史料，试图以新颖的观点对于“北洋军阀”的形成、发展、盛衰、混战、灭亡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其成就在今天仍丝毫未失去其意义。

然而在我国，情况又是怎样呢？我们在当时，在其后（在此以前也是如此），一直都是站在侵略中国的一边而在起作用。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虽然如此，但在我们今天的日本人中间，这些事却正从某些人的记忆中消失。

纵使只看“北洋军阀”统治以后这一时期，我国对于中国的干涉、恫吓、侵略就是不知所止的。不到数年，就发生了“九·一八”满洲事变，污秽的军靴践踏在这片国土，荼毒了无数的生灵。即使仅仅是开始于一九三七年的“七·七”芦沟桥事件而延及八年的日中战争，使中国人民所蒙受的苦难就已是无法估量的了。

历史的审判是无情的，它一再显明，侵略只是在为自己造孽。但是，问题并未就此而获得解决。我们应该偿清前人遗留下来的这笔“债务”，负债时间越长，债务越重。然而我们现时的国策，却是使与这个最近的邻邦更加疏远。这不能不说是极为遗憾的。

也许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吧，在我国对于“北洋军阀”的研究与介绍尚不能说充分。而系统的介绍，以来书为最早。翻译本书的动机也正在于此，如果拙译能为关心中国近、现代史的读者提供某些参考，有助于深入他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学习的话，那就是我的光荣了。

一九六八年秋

译者